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中国近代爱国名人 1



虎门销烟振国威 ——林则徐

高高耸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凝聚了全国人民对英雄们的无限怀念与崇敬。纪念碑的底座上，八幅大理石浮雕，记载着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斗争的一幕幕可咏可叹、可歌可泣的场景。其中的一幅浮雕，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虎门销烟”的雄壮场面。看到它，立刻使我们联想到林则徐这位近代史上的著名英雄。

大炮轰开国门 鸦片流毒全国

历史的长河进入 16 世纪以后，欧洲大陆上升起了资本主义曙光。西方的一些国家陆续地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当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保持着高度封建专制集权的中国封建制度已进入衰老时期。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封建专制统治更趋黑暗腐朽。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和与之并存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构，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都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保护了封建的经济基础。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严峻现实。正在迅速发展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开辟掠夺市场。他们看中了中国这块宝地，处心积虑要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变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1557 年，葡萄牙侵占了我国的澳门。1624 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了台湾南部。1626 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台湾北部。1637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武装船队，首次来华，刚到中国，便炮击虎门炮台，击沉中国水师船只，焚烧官署，劫掠商船，强行通商。最初他们是用毛织品和金属制品等一般商品来进行贸易的。后来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的财富。奴役中国人民，英美等国的资本家开始向中国兜售鸦片。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的汁液熬制提炼而成的一种毒品。具有强烈的麻醉性。一般只可以作催眠、镇静、止痛等药用。如果吸食，则极易成瘾，成瘾后，精神萎靡，体力日衰，等于在慢性自杀。

早在 1660 年，英国就创立了侵略远东的巨大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1757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鸦片产地孟加拉。

英国东印度公司强迫占领地的农民种植罂粟，并逐渐扩大面积，以垄断的方式增加生产，鼓励出口。又进一步垄断鸦片的制造权。在制造过程中，专门研究把鸦片调制出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然后由政府官员交给走私的商人贩来中国。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获取了巨额的利润。在走私的过程中，商人采取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走私贩，用快艇进行武装走私等手段。由于清朝封建官僚体制腐败，明发禁令，暗受贿赂，致使鸦片走私活动越来越猖獗。

鸦片大量走私中国，使利欲熏心的鸦片贩子们大发横财，英美等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更是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而对中国却是一场掠夺，一场毒害，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首先，由于鸦片大量输入打破了原先中国对外贸易优势，中国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白银大量外流。其次，由于白银大量外流，中国出现了银贵钱贱的现象。清王朝的财政发生了危机。清王朝统治

者又把这一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更为严重的是烟毒泛滥全国，吸食者越来越多，吸者在生理和心理上都遭受到极大的摧残。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健康。

忧国忧民 立志禁烟

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使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禁烟。1838年12月12日，广州群众一万余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支持政府处决中国烟贩，抗议英美殖民者竭力干涉中国对烟贩的处决，显示了中国人民决心禁烟、支持禁烟的巨大力量。

在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认识鸦片的危害、主张禁烟的有识之士也不乏其人。其中严禁派以黄爵滋和林则徐为代表，禁烟功绩以林则徐最为突出。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勤奋好学。13岁考中秀才，20岁考中举人。27岁考中进士。他学习兴趣广泛，除儒家著作外，还阅读历史、文学以及水利、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他热爱祖国，敬佩岳飞、文天祥、于谦、郑成功。一生中既做过京官，也做过地方官。为人耿直，忧国忧民。对鸦片流毒中华，造成“民穷”、“兵弱”、“银涸”的灾难，他忧心如焚，强烈主张严禁鸦片。1823年任江苏按察使时，就严厉打击开设鸦片烟馆的土豪恶棍。1832年任江苏巡抚后，更进一步提出严厉的禁烟措施。1837年调任湖广总督，仍继续认真禁烟，还自己出钱配制“断瘾药丸”，强迫吸食鸦片的人服用。他多次给当时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上奏折，尖锐地指出了鸦片泛滥的严重危害。他指出：若不采取坚决的禁烟措施，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由于林则徐的奏折中抓住了要害，使最高的封建统治者认识到鸦片进入中国会动摇其政权，这是道光皇帝最敏感的，使他不得不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考虑，下决心禁烟。于是，连续召见林则徐，听取林则徐的禁烟主张。林则徐详尽地申述了自己的禁烟主张和准备采取的措施。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主张和禁烟措施非常欣赏。1838年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去广东查禁鸦片。

生死度外虎门壮举

禁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外鸦片贩子为牟取暴利，不肯轻易放弃“鸦片贸易”，他们采取了贿赂清朝官员和武装走私等手段，抵制禁烟。林则徐的好友，清朝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在林则徐离北京去广州前夕，对林则徐严肃地说：“据我看，禁烟以后，那些洋人绝不会甘心，肯定会来报复的，你要抓紧练兵，修整武器，加强防卫。”并写了一份禁烟建议书交给林则徐，林则徐在后来给龚自珍的回信说：“你的话，给了我力量，使我禁烟的决心更加坚定。前面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闯它一闯。”而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为首的清朝中央和地方的官吏及其附庸们，有的借鸦片走私而舞弊受益，有的嫉妒林则徐名声，或明或暗地破坏禁烟，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派力量。林则徐明知阻力重重，仍然抱着“冀为中原除以巨患”“置生死荣辱于度外”的决心。1839年1月8日，在北风怒号、冰寒刺骨的天气毅然踏上禁烟征途，离开北京，前往广州。

在赴广州途中，林则徐栉风沐雨，辛苦颠簸，他不顾旅途疲劳，会见了许多了解广东情形的人士，了解掌握了广州地区走私鸦片的许多情况，还同他们商谈了禁烟的办法。他又派人去广州密察暗访，掌握了一批广州重要烟犯的情况。3月2日，林则徐到了江西南部，离广州只有几天的路程了。他及时向广东的布政司和按察司下达了密令，责成他们按照开列的名单立即逮捕61名重要烟犯。为人奸滑、无孔不入、绰号“铁头老鼠”的英国奸商查顿，十几年一直在广州走私鸦片。听说林则徐马上到来，赶紧逃之夭夭。林则徐还没有到达广州，他那严禁鸦片，嫉恶如仇的犀利锋芒，已经寒光逼射、先声夺人，使敌人闻风丧胆了。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和禁烟斗争的最前哨广州。在此之前，两广总督邓廷桢也上奏道光皇帝，表示与钦差大臣“共天血溅，力除鸦片”，成为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的得力助手。林则徐抵达广州后，立即投入到查禁鸦片的紧张斗争中。一开始，主要精力用于了解情况，采取明查暗访的办法，迅速地掌握了鸦片走私、烟馆开设和英国船只贩运鸦片的情况。并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共同商定整顿水师，加强海防。一切准备就绪，接着布置力量准备行动。3月18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等传讯垄断对外贸易的13洋行商人，斥责他们勾结外商串通海关书吏走私鸦片的种种违法活动。并传谕外商，严正指出：走私鸦片是骗人钱财，害人性命，人心共愤，天理难容。责令他们报明所存鸦片的数量，限3天之内把所存鸦片全部缴出，听候处理。并要他们用中、英两种文字写出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向外国烟贩庄严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并警告外商：倘若不知改悔，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

林则徐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而外商蛮横抗拒。企图蒙混拖延。“铁头老鼠”查顿早在两月前闻风逃跑。另一英国老毒犯颠地，仍躲在广州伺机行事。他不但自己不肯全部缴出，还阻挠别人缴烟，态度尤为恶劣。在英国侵略者驻中国商务督查理、义律的策划下，他们千方百计地拖延缴烟的时间。3月21日，外国烟贩和商人40名，在各国商人公所商议对策，决议由公所出面经商行写信，推说对钦差的谕令不能马上回答。3月22日，林则徐传讯颠地，颠地拒绝传讯。3月24日，义律赶到广州商馆，怂恿烟贩们不要缴出鸦片，并在珠江口处部署一艘英国军舰，公开进行战争恫吓。这个狂妄的侵略者向英国鸦片贩子煽动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我最后一息。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个英国军舰在外边，并且由一英国军官指挥。”这天晚上，他又指使颠地逃窜，被商馆内中国工人截回。

面对义律等人的嚣张气焰，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法令的尊严，林则徐果断下令停止对外商的一切贸易，把所有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装卸货物；撤退受外商雇用的中国员工；同时派兵严守商馆。水师炮舰在沿海巡逻，切断了鸦片趸船与商馆的交通。昔日趾高气扬的侵略者们，此刻蜷伏在商馆内，连饮水和食物也发生了困难。义律终于低下了头，不得不通知英国商人缴出鸦片。在林则徐的领导下，侵略者们第一次俯首听命，被迫缴出鸦片，禁烟取得了初步胜利。

1839年6月3日是中国人民应该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天气格外晴朗。

在广东省南部的虎门寨外的一座小山上，新搭起了一座礼台。台前矗立的高杆上，一块黄绫迎风飘舞，上书“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销烟”几个大字。山前山后，担任守卫的士兵，手执刀枪，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山前空地上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熙熙攘攘，一片欢声笑语。

为了彻底销毁鸦片，林则徐多次调查研究，亲自设计了两个15丈见方的销烟池。池底铺上石板，以防烟油入土，池前挖了一个洞，与海相通，池后开了一条沟，与河相连。目的是把鸦片浸化以后，引河水入池，可把烟渣全部冲进大海。

销烟的准备工作一切安排就绪，下午，林则徐率文武官员登上礼台，随来的还有一些外国商人。礼炮轰鸣，群情沸腾。林则徐一声令下，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开始了。

一群身体健壮的年青人，赤着双脚，光着脊梁，站在销烟池的跨木上，先把盐撒入池水内，接着把切成小块的鸦片投入池内，再投入生石灰。然后，他们手持铁锄和木耙，用力在池内来回搅动。顿时池水沸腾，烟雾迷漫，袅袅升空，并随之放出一股股难闻的臭气。成块的鸦片都销化在销烟池了。过一阵，涵洞闸门开启，销化的鸦片渣沫随着潮水流向浩瀚大海。

鸦片被销毁了，老百姓看在眼里，激情万分，他们跳啊，叫啊，欢呼声响彻了虎门上空。他们无不从内心佩服林则徐为民族为国家利益而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气节胆略，感激林则徐为中华民族除了大害。

从6月3日到6月25日，用了23天的时间，收缴的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行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一个伟大胜利。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具有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它伸张了正义，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谱写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新的光辉篇章。

林则徐在严厉销烟禁烟的同时，积极维护正常的贸易往来，他在虎门销烟的现场就对当时在场的外国商人说：“我们禁的是鸦片，不是正当的贸易。你们要做买卖，我们欢迎。如果还要私贩鸦片，我们是‘东西没收，人要严办’”。

在虎门销烟前后，林则徐将主要贩烟国与一般国家，烟船与商船，鸦片贩子与一般外国商人加以区别。在禁烟问题上，孤立了少数的贩烟国和鸦片贩子，取得了许多国家的支持与同情。林则徐也非常清楚，那些被惩罚的贩烟国和鸦片贩子绝不会甘心失败，肯定还要报复。他一边禁烟，一边抓紧练兵，修整武器，加强防卫措施。他严正警告那些面露奸笑的外国人：“谁要动武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不怕打仗！”这些都表现出了林则徐为国为民的高贵品质，处理军国大计的雄才大略，卓越的政治才干和清醒的政治头脑。

针锋相对远见卓识

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英国资产阶级集团利益的代表者义律在虎门销烟的第一个回合中遭受惨败后，进而采取阴谋诡计，肆意挑起事端。妄图发动武装入侵以挽回他们的损失。7月7日，一批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行凶作恶，殴打当地中国居民，内中林维喜因伤重于次日身亡。案发后，林则徐多次派人交涉。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百般包庇。8月12日，在一艘英国船上设立法庭，只判5名行

凶者轻微罚金，接着就把未能查出凶犯作为审讯结果，通知中国当局。

针对义律的这种公然侵犯中国法律主权，又不交出凶手的恶劣行为，林则徐下令停止对英船的柴、米食物的供应，对义律和英人退居的澳门进行封锁，禁绝柴、米、食物运入，撤退全体中国雇员，驱逐义律等出澳门。义律被迫退居货船，仍寄碇海上以待武装接应。8月底，英国“窝刺疑”号自印度驶抵香港，义律又顿时嚣张起来。军舰“士密”号和“华仑”号先后驶抵中国，义律蠢蠢欲动。9月4日下午，义律率领“士密”号等4艘大小船舰窜到九龙，骄横地命令中国官员，限半小时内为英军准备好所需的物品，否则就开炮击沉中国兵船。爱国官兵断然拒绝。半小时后，英军悍然开炮，中国水师奋起回击，海岸炮台也发炮支援。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英国的一艘双桅船被当场击沉，几十名侵略军被击毙，义律的帽带也被打飞。他惊魂未定，慌慌张张带领其余船舰狼狈逃出了海口。义律贼心不死，接着又挑起了穿鼻洋海战，被中国水师打得大败而逃。从11月4日至13日的10天里，英国兵船在珠江口官涌一带，连续6次进行武装挑衅，都被中国守军击退。

当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立即大造舆论，狂热宣扬对华战争。从中国逃走的鸦片贩子查顿、马地臣等也在英国上下奔走，鼓吹战争。外相巴麦尊收到义律主张侵华战争的信后，立即叫嚣：“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9月底，巴麦尊召见了查顿，留下了查顿提供的有关中国的军事地图、表册，并讨论了侵华的具体细节问题。

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正式作出派舰队到中国的决定，并训令印度总督就近支援。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曾任好望角舰队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决议案。6月，英国侵略军，4000人（后增至1.5万人）及由48艘舰船组成的远征舰队侵入中国。

民族斗争的烈火把林则徐这位坚决禁烟派的首领，又铸锻为抗战派的首领。

对于侵略者不甘心于禁烟中的失败，转而进行武装侵略，林则徐是早就意料到了的。早在1839年3月，林则徐就同邓廷桢、关天培一道指挥，在虎门海门武山、横档山之间江面最狭处，安设了两道横江木排铁链，用以堵截入侵敌船。穿鼻海战之后，他更是大力整顿海防，加强守备。他抓紧增修了虎门炮台，加固排链，从澳门和新加坡购买西方制造的大炮200门，装备虎门各炮台，使虎门炮台的大炮增至300余门。并督率水师，加紧操练。他教育全体官兵，号召人民群众“人人持刀痛杀”侵略者。林则徐在反对外国鸦片侵略的过程中，清楚地看到了沿海的广大农民和渔民对英国侵略者“皆动公愤”，认识到“民心可信”，“民心可用”。招募渔民5000人组成水勇，授以火船，精练夜袭火攻之法。

由于林则徐坚持对内禁烟，外抗侵略，而中国人民对于鸦片早已恨之入骨，对于林则徐禁烟销烟的壮举无不敬仰钦佩，而对英军的侵华无不同仇敌忾。林则徐顺应民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使广东的海防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沿海处处有备，军势壮盛，号令严明，严阵以待英国侵略军。

林则徐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但他有远见卓识。他看到了鸦片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毒害作用，决心禁烟，“若鸦片一日不断，即一日不肯歇手”。

他怀着维护国家主权，根绝鸦片祸害的满腔热血，抵抗外国侵略。林则徐还组织专人翻译外文书报，编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和《各国条律》等，以了解外国情况。他在外交上既坚持了正义的立场，又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使中国强大而抵抗外来侵略。他在长期闭关自守的满清王朝时代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与英军的作战交手中，很快做到知己知彼。他主张避敌之长，攻敌之短。“英军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乘风破浪，是其长技”，而林则徐则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作战方针。

尤其可贵的是，林则徐在备战御侮时，相信“民心可信”，“民心可用”。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统治阶级中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

经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的努力，禁烟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而告终。鸦片战争失败了，清王朝竟归罪于林则徐，把他充军到新疆。在新疆期间，他敏锐地觉察到沙俄妄图吞并我国西北的狼子野心。提出了“屯田耕战”的建议。他大声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发出要防备沙俄入侵警号的人。

综观林则徐的一生，不愧为是一位名标千古的民族英雄。

反侵略的猛将 ——邓廷桢

在 100 多年前的禁烟运动中，作为林则徐禁烟得力助手的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永远为后人崇敬和怀念。

邓廷桢（1776~1846），江苏省江宁人（今南京）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邓廷桢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加之本人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从小就显露出超人的才华。25 岁考中进士。一生中做过知府、按察使、巡抚、总督等。他为官清正，善于体察民情。政绩斐然，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1835 年，邓廷桢由安徽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这年秋天，他离开了治理 10 年的安徽，来到了椰风馥郁，稻浪金黄的广州。

当时，英美等国正在大肆走私贩运鸦片来华，烟毒泛滥全国，鸦片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受害最为严重。珠江口外零丁洋水面经常停泊着走私贩卖鸦片的趸船。有时多达 20 多艘。而广州城里遍布包售鸦片的黑店——大大小小的“窑口”和烟馆。封建官僚大多吸食鸦片成瘾，并利用职权包庇烟贩。而中外鸦片走私商人则用重金贿赂官吏。这样，中外商人勾结、商人官吏勾结，狼狈为奸，从中渔利。广东水师的官宾不但争相吸食鸦片，还同外商暗中约定：走私一箱鸦片，必须行贿 5 元到 10 元。他们甚至于每月到外商的鸦片船上，按箱索贿，当面收钱，不以为耻。一些平民百姓也因鸦片的毒害，吸食成瘾，病入膏肓，形容枯槁，倾家荡产，衣衫破烂，倒毙街头。由于鸦片源源流入，致使白银大量外流。两广地区银两枯竭，生意周转不灵，店铺纷纷倒闭。鱼米之乡的珠江三角洲千疮百痍，凄哀荒凉，对于鸦片的危害，当时有人写《炮子谣》一首，揭露甚为深刻。诗中写道：“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畏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君知炮打肢体裂，不知吃烟肠胃皆熬煎。君知火烧破产业，不知买烟费尽囊中钱。”

对于鸦片在中国泛滥，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形成禁烟和反禁烟两派。一方以林则徐为首领的禁烟派主张严禁鸦片输入中国，另一方以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反对派要求准许公开买卖鸦片。后又出现了以许乃济为首的弛禁鸦片派，建议允许外国输入鸦片，但只准以货易货，避免白银外流，并提倡国内种植鸦片，减少进口，民间吸食鸦片，可以不管不问，听之任之。道光皇帝在禁与不禁或弛禁之间犹豫不决之际，将许乃济的奏折交邓廷楨等人征询意见。此时的邓廷楨与广东巡抚祁埏、粤海关监督文祥联名复奏，赞同许乃济弛禁的主张，还拟定了具体实施措施。邓廷楨此时对鸦片的危害还没有认识清楚，在对待鸦片的问题上走了一段弯路。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和触目惊心的事实，使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邓廷楨在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幡然悔悟。由赞同弛禁逐渐转变了禁烟派一边，坚决反对弛禁鸦片派，支持林则徐的严禁鸦片的主张。

邓廷楨由赞同弛禁转变为主张禁烟后，就开始了严厉打击鸦片贩子的活动。1837年邓廷楨先后两次传谕英国商务监督义律，限令尽快撤离零丁洋面停放的鸦片趸船。老奸巨滑的义律，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邓廷楨大怒，立即下令严禁武装走私的快船靠近鸦片趸船，对敢于违抗命令的坚决予以兜剿，同时在广州城里全面行动，切实查抄包售鸦片的“窑口”。基本上切断了中外鸦片贩子的来往联系。邓廷楨采取的这一有力措施，犹如釜底抽薪，堵水截源，沉重地打击了外国烟商。使外国烟商坠入了山穷水尽的窘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外国烟商又铤而走险，改为将鸦片直接运到沿海岛屿间零售。针对这种情况邓廷楨又命令中国官船在海上加紧巡逻堵截。有一次，一伙走私犯分乘几艘帆船，企图把一批鸦片运到沿海岛屿去贩卖。被中国船只拦击，有的走私犯被当场击毙，有的仓惶逃命，所运鸦片也大部分散落在海水之中。

邓廷楨禁烟的决心是坚定的。为了彻底禁烟，1838年他下令逮捕了两千多名中国的贩毒犯和吸毒犯，并令鸦片吸食者交出烟具，在邓廷楨的感召和严令下，数以万计的鸦片吸食者自动缴出了烟枪和烟锅，决心戒除烟瘾。对于胆敢违犯命令、继续贩烟吸烟者，则坚决处罚直至处决。有一个名叫义士的英国烟贩，无视中国政府的法令，利用特别武装的欧洲快船，悬挂着英国旗帜，载运成批鸦片，公然开进珠江，停泊在江边的商馆前面。中国政府发现后当即下令没收毒品，将义士驱逐出境。这个英国鸦片贩子虽然赖着抗拒不走，慑于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最后不得不在口供上签字认罪，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广州。对1838年12月12日，在广州爆发的上万名群众围攻商馆的爱国行为，邓廷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场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人妄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嚣张气焰。1838年在广东地区，在邓廷楨的悉心领导和支持下，群众禁烟运动初步发动起来了，奏响了这一运动的胜利序曲。

这年年底，坚定的禁烟派首领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欲展宏图的邓廷楨听到这一佳讯，欢欣鼓舞，激动万分。当即写信给正在路途中的林则徐，表示一定与林则徐“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在以后的禁烟销烟斗争中，邓廷楨作为林则徐的得力助手，逐步成为当时第二个有力的禁烟派首领。

1835年3月10日，经过两个月长途跋涉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来到了已是和风拂面、百花争妍的广州城。这天，邓廷楨率领广州城的文武官员来到

效外天字码头，热情迎接乘船前来广州执行禁烟重任的林则徐。二人见面后，邓廷桢对林则徐诚挚地说：“林大人，您高度的爱国热情实在令人钦佩，我已改变过去弛禁的主张，决心协同您严厉禁烟。烟毒不绝，誓不罢休！”邓廷桢的衷肠肺腑语使林则徐深受感动，他频频颌首：“邓大人，烟毒不绝不得了，禁烟是我们的责任啊！”

林则徐的到来，广东沸腾了。使原来已形成的禁烟热潮更加高涨起来。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邓廷桢同心协力地合作，广大群众的高昂激情，使查禁鸦片的斗争紧锣密鼓，捷报频传。4至6月间，邓廷桢协助林则徐共收缴鸦片2万多箱，230我万斤。捕获烟犯700多名，缴获烟枪3万多支。烟锅500多口。6月3日至25日把收缴的鸦片全部销毁在虎门滩的销烟池内。销烟期间，邓廷桢多次随同林则徐到销烟现场，巡视监督。在专为销烟而搭起的礼台上，邓廷桢和林则徐眼看着销毁鸦片的雄伟气势，内心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战斗的激情。

震撼世界的虎门销烟壮举，显示了中国人民的禁烟决心和伟大力量，使一切爱国的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同时也深深刺痛了反动分子，他们寻机鼓噪，喋喋不休。编造歌谣，中伤诽谤。邓廷桢一针见血地斥责他们的卑劣行为“无非为烟匪泄忿”虎门销烟，沉重地打击了英美侵略者，其中尤以英国损失惨重。英国侵略者对中国的禁烟运行恨得咬牙切齿，不断地寻找借口在广东地区进行武装挑衅，邓廷桢毫不畏惧，一方面继续坚决支持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一方面加强防务，添置武器，教育士兵，做好迎战的准备。同年3月，邓廷桢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道在虎门海口武山横档山之间江面狭窄处安设两道横江木排铁链，以堵截入侵的外国舰船。他还时常亲临前线，视察炮台，严格督练士兵。1939年11月间，在邓廷桢的指挥下，中国部队在广州海面先后6次击退了挑衅入侵的敌人。邓廷桢与林则徐经常在一起，共商禁烟与反侵略的大计，他们也经常一起新临防线视察防务。有一天，邓廷桢与林则徐又冒着风雨，一起巡视在虎门海防线上。此时，雨泼风啸，旌旗猎猎，大炮寒光闪闪，内河入口处木排铁链如长虹横贯，江水中一字排开的兵船，坚如磐石，威武雄壮。邓廷桢睹景生情，心潮起伏。慷慨吟唱：“万金潮玉龙穴雨，四围山响虎门风。长旗拂断垂天翼，飞炮掠回饮涧虹。”林则徐此时的心情与邓廷桢一样，随声应和道：“销残海色空尘瘴，听彻潮声自雨风。下濂楼船迟贯月，中流木梯直长虹。”唱罢，二人相视大笑。这不是诗人骚客的作诗答对，而是发之于两颗爱国之心的豪情，他们一起并肩战斗，取得了禁烟销烟的伟大胜利，他们也做好了迎接更加艰苦险恶考验的准备。

由于林则徐和邓廷桢二人的互相配合，共同努力，广东沿海的军事防务力量大大加速。但当时其余沿海各省防务空虚，若侵略军改从其他沿海登陆，便会长驱直入。当时的福建沿海，也是鸦片走私十分猖獗的地区之一。该地物产丰富，海岸曲折，美丽富饶，是英国侵略者一个主要进攻目标。为了加强福建沿海的军事防务力量，1839年底，邓廷桢被调往福建，任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由林则徐接任。1840年春天，邓廷桢离开了治理4年之久的两广，离别了禁烟的最前哨广州，也离别了并肩战斗将近一年的好友林则徐，风尘仆仆来到抗英斗争的前哨福建。

虎门销烟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英国强资的所作所为，使邓廷桢清醒地认识到：英国侵略者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时刻有大举武装入侵中国的危

险。他到达福建后，一点也没放松警惕，并从福建人民决心抗击侵略的意志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他更进一步懂得了“夷人无能为，我师大可用”的道理。到福建后，邓廷桢立即与当地其他官员共同筹议防守事宜，委派兴泉水道刘耀椿为督办，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战备工作。由于满清政府整个官僚体制腐败，官员们贪图安逸，因循畏葸，尚空谈，欠务实，战备松垮，对英军可能的进攻不以为然，有严重的麻痹轻敌思想。邓廷桢针对这种情况，诚恳地对文武官员剖析说：“干戈非儿戏事，与其临渴掘井，莫若未雨绸缪。”及时督促他们警醒，要求他们振作精神，踏踏实实地抓紧战前准备。邓廷桢不但循循善诱，教育开导他人，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夜以继日，不顾雨淋日晒，东跑西奔，来往奔波于泉州、厦门之间，精心筹划防务。邓廷桢身先士卒的行动，使广大官兵深受感动，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之心，士气大振。

要战胜外国侵略者的武装进攻，没有一个安定巩固的后方是不行的。尤其是那些厚颜无耻与洋人勾接在一起，为钱财而出卖灵魂的汉奸，具有更大的危险性。邓廷桢注意了这一点，他在给刘耀椿的一封信中写道：“此时攻堵夷船，是第一义，而灶底抽薪，全在查拿汉奸。”他严令各地加强巡逻，盘查行人，清除汉奸，缉拿海盗。对一些重要的案犯亲自审理，严加惩办，毫不留情。

由于满清政府多年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军事武器特别是海防武器早已落后陈旧，地方官僚贪图安逸，很少有人过问。当时的福建海防就是这种情况，力量非常薄弱。海岸炮台大不过十几丈，安装的几门重不过千斤的旧炮，射程有限，火力也不足。侵略者们一旦发动进攻，实在不堪一击。当时的军费又很紧缺。邓廷桢便会同福建巡抚，发动全省文武官员自愿捐献白银2万两，设法购置了14门洋炮，火速运到福建安装。又新铸6000斤和8000斤的重型大炮各16门，增强了海防力量。对于怎样抗击敌人登陆，邓廷桢也作了周密的安排。他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命令近时凿舟沉石，封填内河河口，在沙滩上的要隘处设置炮台；在侵略军可能登陆的地点挖掘陷坑，暗埋钉板，布撒铁蒺藜，使一旦上岸的敌人寸步难行，束手就擒。他还招募水勇，进行训练，征雇商船，海上巡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经过邓廷桢的精心筹划，认真备战，逐步把一个不堪一击的福建前线，建成一堵屏障祖国东南海疆的铜墙铁壁。

1840年6月，英国正式发动侵华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分乘48艘兵船，进犯广东。他们按原定侵略步骤封锁珠江后，见广州早有戒备，又杀气腾腾，进犯福建。7月初，英舰5艘窜犯厦门。邓廷桢得知军情紧急，日夜兼程，奔赴厦门，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击退了英军的多次进攻。猛烈的炮火，轰击敌船，有的被击沉海底，有的如受伤的野兽仓皇逃窜。勇敢的水师和水勇们争先恐后，跃上敌舰，与敌人展开肉搏，更使英军闻风丧胆。邓廷桢领导爱国军民顽强战斗，给英军以痛击，有力地遏止了英国强盗对福建的入侵。

邓廷桢这位反侵略的猛将，深受人民的爱戴拥护。而英国侵略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英国侵略者在攻陷了定海，威逼天津时，借口说林则徐、邓廷桢“残害”了英国人，要求满清政府割地赔款。投降派占了上风，无能的道光皇帝慌忙派投降头子琦善到天津向英国侵略军屈膝求和。为了讨好英国人，以“误国害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邓廷桢革职，并责令邓廷桢速回广

州，听候查处。

邓廷桢回到广州，遭受蒙冤受罚的无情打击，仍没能使他的爱国之心有丝毫的动摇，对琦善之流打算把厦门或香港拱手割让给英国的卖国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一百多年过去了，邓廷桢的热爱祖国，反抗侵略，英勇战斗的精神，仍激励着中国人民。

功高靖海上城倚 傲霜花艳岭南枝 ——关天培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了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历史上有多少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慷慨捐躯。在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著名的爱国将领关天培，就是为了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勇敢顽强抗击英国侵略者而战死疆场的。

关天培（1780—1841），江苏山阴（今淮安）人。幼年读书习文，原想科举出仕，后见国防日衰，改文习武，投笔从戎。行伍出身，历任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代理江南提督等职。1834年被授予广东水师提督要职。

关天培到广东任职后，针对当时对海关和水师贪污、贿赂的腐败风气，严加治理。他一上任就张贴告示，号召下属清除旧习，振作精神。

另一方面，针对长期以来沿海炮台失修、防务废弛，而英国军舰又公然闯进我国内河，关天培提出了“禁绝内奸，加强战备”的措施。他还亲自到各处察看地形和虎门各炮台的防务，亲自测量海口宽窄，海山深浅；根据大炮的射程确定炮台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关天培制定了新的海防措施：把虎门的海防建成六处炮台、三道防线，当敌舰来犯时，六处炮台遥相呼应，三道防线层层阻挡，连环轰击。同时，他还下令在通向内河的江面上设置道道木桩和几条大铁链，水下钉插许多暗桩。虎门要塞，经过关天培的精心建设，炮台虎踞，威武壮观。昂然翘首的大炮，随时可以喷射愤怒的火焰，火力配备相当强大。

对于水师队伍的建设，关天培更是特别重视。他从速整顿水师，挑选英勇精壮的士兵任下级军官；对水师加强军事训练，演习进攻、守卫、策应、配合等军事技能；经常督率水师研究、绘制各海域地势图，并把文件和图式编成《筹海初集》供官兵学习之用。经过关天培的严格训练，原先战斗力很差的水师，很快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广东的整个防务，经过关天培的精心建设，固若金汤，使外国侵略者望而生畏，外国的军舰再也不敢象从前那样横冲直撞、耀武扬威了。英国军舰几次窜到广州海面，都因一看中国官兵防备森严，无机可乘而掉头逃走。当地民谣对关天培任职的虎门称颂道：“虎门天台，金锁铜关。入来不易，出去更难。”几年中，海疆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为后来的禁烟运动提供了民心、物质、军事等有利条件。

奋不顾身 指挥炮打“窝拉疑”

1839年，林则徐、邓廷桢领导的禁烟运动，在广东轰轰烈烈的展开。关

天培坚决支持禁烟运动，成为林则徐禁烟的又一得力助手。他全力以赴地协助林则徐等人调查外国商人进行鸦片走私的情况，迫伊鸦片贩子们交出鸦片237625斤，全部在虎门销毁。

在查烟、禁烟、销烟期间，英国侵略者不甘于他们的失败，曾多次进行武装挑衅，妄图用武力威胁中国的禁烟运动，都因关天培指挥中国水师英勇抗击，以失败而告终。

虎门销烟后，英国的侵华头子义律不甘失败，竭力扩大事态。并请英印总督派尽可能多的兵船来中国，向中国人民示威。英国水手来中国后，为非作歹。1839年7月7日，在九龙尖沙嘴打死村民林维喜，并打伤中国村民多人。中国政府官员要求义律交出打人凶手，义律不但不交出凶手，反借林维喜案件肆意挑衅。林则徐下令停止对英船的柴、米、食物的供应。义律狗急跳墙，武装威胁，在九龙山炮台附近，威逼中国守将赖恩爵：“限你们半小时内把吃的送给我们，不然就开炮打沉你们的战舰。”挑起了九龙卫之战，被中国士兵打得大败而逃。但时过不久，英军司令士密又率领“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两艘兵舰，窜到穿鼻洋海面上，向守卫在沙角炮台的水师提督关天培送出一封信，他在信中狡辩说：不知道凶手是谁，要求先供给他们食物。

关天培愤怒地回答说：“杀人凶手就是英国人，不交出凶手，绝不给食物。”

士密碰了一鼻子灰，恨得咬牙切齿。他恼羞成怒，下令向关天培的船开炮。

当时已60多岁的关天培，面对英国的炮火，面不改色，雄赳赳地站立船头，拔出腰刀，下令还击。士兵们担心关天培出危险，劝他先退到别的船上。关天培回答说：“大敌当前，我怎么能躲开呢？接着大声命令：“开炮，给我狠狠地打！”

突然，英军的一发炮弹打过来，擦着关天培的胳膊飞了过去，打断了他身后的桅杆。此时关天培的胳膊鲜血直流，士兵们又一次请他下船躲避。关天培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威武地站在甲板上，好象没受伤一样，没有理会士兵的劝说，只是一个劲地挥着腰刀，人声命令：“开炮！快开炮！”关天培勇敢镇定，士兵个个也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中国水师以猛烈的炮火还击敌人。300斤重的铜炮向“窝拉疑”号发出了怒吼，“轰”的一声，击中了船头，敌船顿时帆斜旗落，冒起滚滚浓烟。船上的侵略者慌了手脚。指挥官士密抱头窜进了船舱，英军个个吓得丢魂丧胆，东躲西藏，船上一片混乱。

关天培兴奋地高喊：

“打得好！再给他两炮！”

又有几发炮弹击中了“窝拉疑”，英军再也支持不住，两只贼船狼狈逃走。

在以后的日子里，英国侵略者多次对中国水师进行武装挑衅，中国水师在关天培的指挥下，使他们的行动都以惨败而告终。

英勇善战 主动出击

英国侵略军每次侵犯都没沾到便宜，他们的军舰不敢轻易进犯了，只在海面上停泊，以窥探时机。而他们的食物、淡水等给养由汉奸偷运供给。为

了打击英国，惩罚汉奸，关天培设计了火船攻击战法。就是在快船上装满喷筒、火罐和硫磺等引火易燃物品，派英勇善战的将领在夜里带火船悄悄开到敌舰和汉奸船只经常接头出没的沿海岛屿潜伏起来，到敌舰驶来与汉奸进行肮脏交易时。火船突然驰出，他们团团围住，士兵点燃引火物，霎时间，数不尽的火筒、火罐、喷出条条火龙，一齐飞到敌船和汉奸船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洋人和汉奸被烧得鬼哭狼嚎，不死即伤或掉进大海。

1840 年上半年，中国水师在关天培的指挥下，先在长沙湾烧毁敌船 30 多只，生擒汉奸十几名，烧伤落水者无数。后又袭击停泊在磨刀外洋的夷船，火烧大小夷船 11 只，抓获汉奸 13 名。在冷水角袭击英国兵船，致敌船重伤落荒而逃。一天傍晚中国水师又遇 10 艘敌舰，便立即出击，英勇作战，重伤指挥舰“架厉”号。取得了这次海战的胜利。

由于关天培指挥中国水师，主动出击，英勇善战，又严厉打击了接济英国侵略者的汉奸，使英国侵略军不敢轻举妄动，整日漂游不定，狼狈不堪。关天培抗击敌人的英雄行为，深得人民的赞扬。人们称赞他是西海长城，也有人把他比作剿倭名将戚继光。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正式决定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武装侵略。1840 年 6 月 21 日，英国军舰 40 艘在广东水面集结，28 日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关天培和林则徐一道研究破敌之策，坚决抵抗侵略。关天培又进一步加强了虎门海防。增设大炮，操练水师。英国侵略军见虎门海防戒备森严，一直未敢进犯。

激战虎门为国捐躯

英国侵略军在广州沾不到便宜，便从沿海往北进犯，八月窜至天津海口，直接向清朝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声言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必相战不息”。腐败的清政府被英国的大炮所吓倒，一些投降派官僚也乘机向道光皇帝大进谗言。他们把战争的起因归咎为林则徐的禁烟。昏庸的道光皇帝竟将林则徐革职，任命投降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国人进行交涉。

琦善到达广州后，就下令拆除珠江口的木排。铁链和暗桩，使关天培苦心经营多年的防御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还遣散了全部水勇，裁减了 2/3 的兵船，使海防力量大大削弱。他为了讨好英国人，允许英国人登陆察看地形，探测内河。致使英国人对我海防情况了如指掌。英国人没有了顾忌，于是向虎门发起了进攻。

1841 年 1 月，英军调集了 20 多艘军舰，2000 多名士兵，向只有数百名守军的虎门第一道防线沙角、大角两炮台发起了进攻，中国守军在副将陈连升的指挥下，与侵略军展开了一场血战。由于琦善已将海防废弛，又拒绝增派援兵。中国将士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英军占领了沙角、大角两炮台。

卑鄙无耻的琦善在广州按兵不动，坐视炮台失守，反而向道光帝劾奏关天培，指责沙角、大角两炮台的失守是由于关天培的指挥失误造成的，要朝廷对关天培从重治罪。道光皇帝听信谗言。以督率无方的罪名，将关天培的顶戴革去，令其戴罪立功。关天培蒙受大冤，但仍以大局为重。他不顾年事已高，到处奔波，察勘工事，督促加固。并请求琦善速修海防，增兵虎门。但琦善决意卖国，置之不理。关天培自度虎门难保，唯有一死，报效国家。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分给守卫炮台的士兵，并将自己的几枚落齿和几件旧

衣，用木匣密封寄回家中，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

1841年2月，英国侵略者集结18艘兵舰配备几百门大炮进攻虎门第二道防线。守卫在这里的关天培向琦善报告，请求他增派援兵，补充弹药。琦善不但无理，还斥责关天培说：“你这么干，惹恼了洋人，你敢负责吗？”关天培对于琦善的这种卖国的行径愤怒到了极点。

2月26日，侵略者对关天培亲守的靖远炮台进行了猛烈的轰击，整个炮台浓烟滚滚，弹片横飞。由于敌人炮火猛烈。士兵相继受伤或阵亡。关天培也全身负伤10多处，血染战袍，但他坚持不下火线，手持钢刀，指挥战斗，并亲自开炮轰击敌人。关天培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崇高精神，激励着炮台守军。他们决心与阵地共存亡，誓死与敌人血战到底。英国侵略者虽然船坚炮利，人多势众，但在守军的坚决还击下，伤亡惨重，也没沾到什么便宜。战斗越来越激烈，关天培视死如归，冒着敌人的炮火，毅然挺立在炮台前沿，怒目凝视着前方，当众宣誓：“人在炮台在，不离炮台半步。”敌舰有的被击沉，有的被击伤，登岸的敌人也被歼灭，尸体布满了滩头。但是中国士兵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多数将士相继阵亡。这里，英军在炮火掩护下攻上炮台。关天培挥舞佩刀，把冲上炮台的鬼子一个个劈下去。最后因伤重力竭，为国捐躯。镇守虎门的400名爱国将士也全部壮烈牺牲。

关天培殉国后，人们深切怀念这位爱国将领，在他牺牲的地方，为他修建了专祠。林则徐特意为他的这位禁烟助手、抗英战友写了“功高靖海长城倚，傲霜花艳岭南枝”的挽联，挂在祠堂门口。

但开风气而为师 ——龚自珍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不仅血腥地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对于封建士大夫也严加箝制。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一般学者噤若寒蝉，文坛上下，一片死寂。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19世纪30年代末，这首诗象一阵冲天的惊雷，滚过黑沉沉的神州大地，震撼着人们的灵魂。

这首诗写于1839年，作者是清代的思想家、诗人龚自珍。

勇闯新路

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瑟人、爱吾，号定庵，浙江仁和人，1792年出生在一个世族书香和五代官宦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除了任官，还有著述。母亲是著名的古文学家段玉裁的女儿，也会写诗作文。这样的家庭环境为龚自珍的成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从小资质聪慧，思路敏捷，兴趣广泛又肯刻苦钻研。6岁时，跟妈妈学诗；12岁时，外祖父教他习诵《说文解字》；14岁，开始考订历代官制；16岁时，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钻研图书目录学；17岁时，进一步收集古代钟鼎碑刻，对金石学发生了浓厚兴趣；19岁时，已能填得一手好词了。等到20岁出头，他已经成了一个才华出众的诗人和根底很深的学者。

少年时代的龚自珍聪明慧颖，喜读诗书，又多情善感，很有一点不凡的抱负，自谓是“少年哀艳杂雄奇”，“亦狂亦侠亦温文”。除了读书而外，还还喜欢舞剑、吹箫。他曾经说：“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心力无者，谓之庸人’”。看来，他是不想在封建压制下自甘寂寞的。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是当时著名的学者，非常欣赏龚自珍的才华，龚自珍如果肯于埋头做死学问，生活是不必多虑的，但是，封建统治昏庸残暴，贫民百姓饥寒交迫，国家渐渐破败，这都震撼着龚自珍的一颗赤子之心。“不伦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哪不胜栽禾？”龚自珍面对黑暗的现实，满怀悲愤。有一天夜里，他站在淮河边，看到船夫们喊着低沉的号子，艰难拉纤，把装满官粮的沉重的大船拖向上游，他心中感到十分羞惭：“我也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促使他言他人所不敢言、为他人所不敢为。他时时想冲破封建束缚。年少时随做官的父亲来到北京，在私塾里学习四书五经，他常常悄悄地溜出去，到附近的寺庙里听人宣讲佛学。他又曾跟人学习较为活跃的《公羊春秋》，“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今烧尽鱼虫学，甘做东京卖饼家”。这些诗句表现了他突破网罗的欣悦心情。他的外祖父深感不安，曾谆谆告诫，“努力为名儒、为名臣”，报效朝廷，“勿愿为名士”。外祖父的担心变成了事实。

年青的龚自珍跋涉在通往成功的征途上，对于这个受到很多人瞩目和称羨的年青人，外祖父段玉裁更是视若掌上明珠。他的“自珍”和“爱吾”的名字，就是外祖父给起的。老人家为了给他起名字，还专门写了篇《外孙龚自珍字说》的文章，说明只有爱人才能自珍自爱，自珍自爱才能更好地爱人的道理。对于外祖父的谆谆教诲，这个年轻人一直铭记在心。外祖父打心眼儿里喜欢和赞赏这个才气横溢的外孙。然而，龚自珍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多次参加考试，屡次名落孙山。27岁才中了举人，又是10年过去，38岁上才中了进士，内客中书这样的小官一做就是十几年，仕途可谓坎坷。龚自珍对于窒息、扼杀人才的科举制度非常憎恨，曾经作文讽刺。他说，通过八股考试为国家选拔经世济用的人才，事情非常隆重，而其中最重要的，则莫过于书法精良。我龚自珍老大无能，总是落榜，退回家来，研究出研墨、膏笔等法数百，传给后人，以便他们于取功禄。仕途不顺，使龚自珍把精力用在创作、撰述上面，成为我国晚清杰出的诗人和思想家。

1813年，有一支起义队伍，里应外合，攻进了紫禁城。这可是皇朝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嘉庆皇帝极为恼怒，发下谕旨，痛斥百官昏庸无能，没有良心。龚自珍得知后，写出《明良》四论，对嘉庆皇帝的谕旨作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说，君明，为臣的才能贤良。现在实行的专制统治，不仅压迫了平民百姓，就连封建士大夫也失去了议政的自由。秦汉之前，三公可以与君王坐而论道，唐宋时代，大臣也可以从容殿下，激昂陈词。而现在，则“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百官大臣毫无思想、行动的自由，唯皇帝一人之命是从，其结果呢？“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他们只图“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如此这般，一旦国家有事，又怎能挺身而出、担当天下呢？祸根究竟在哪里，不是非常明白吗？龚自珍的文章“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就连他的外祖父也不禁赞叹道：“老了、老了，还能看到这样的人才，真是难得啊！”

在龚自珍的时代，清朝以文字治人罪的“文字狱”，还是很厉害的。读

书人动辄得咎，往往由于自己的文字而罹难的冤案，还时有发生。按照一般的情况，龚自珍在学术上只要沿着外祖父指点的路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功成名遂是指日可待的。但他没有这样做。由于当时社会危机的影响，各族受压迫人民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不断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敏感的龚自珍真切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激烈跳动，他再也不能继续走考据学的老路了。他并不因为害怕涉及政策问题，而一心研习文字学、音韵学，以求得一时的太平和安逸；也没有离开当时的现实，而一头钻到故纸堆里去搞那种古老而又艰深的学问，如同一般的学者那样。他的学问所涉及的方面，要深广得多。自然，他并没有辜负外祖父的殷切期望。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布满荆棘的荒原上，勇敢地、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路。他终于成了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者，成了主领清代文坛“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爱

啊国诗人。

主张变革

21岁以后，龚自珍写了很多批判和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政论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如《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尊隐》等篇，都闪烁着战斗锋芒。《明良论》共有4篇，主要抨击了清王朝官僚政治的极端腐败，指出封建官僚集团的寡廉鲜耻和昏庸无能。在《尊隐》一文中，作者预言：有一种反抗力量，即那种大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山中之民”，正在蓬勃崛起，腐朽的清王朝有可能被他们所埋葬。尽管“山中之民”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力量，龚自珍当时还无法明确指出；然而，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这位才思敏锐的诗人，仿佛已经谛听到大规模反抗清王朝斗争暴风雨来临前的隐隐雷声了。这正是鸦片战争前夜清代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客观现实，在龚自珍脑海里引起的回声。

这些政论文章，还表达着龚自珍一贯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揭露和抨击社会时弊，目的是唤起最高统治者警觉，以实行他变法和改革的政治主张。“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在这一点上，他把“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宋代王安石作为学习榜样，曾经9次亲笔抄录王安石那篇著名的力倡改革变法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到38岁，他第六次参加进士考试，还以这篇文章的精神，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写成《对策》，进一步阐述自己要改革和变法的主张。所以，当时有个叫张维屏的诗人，就这样说过：“定公得志，恐为王荆公。”意思是说，如果龚自珍的政治主张得到实行，恐怕他就是又一个王安石了。

龚自珍认为，“一祖之法无不弊”，要振兴国家，就必须实行改革，而要实行改革，就必须有一批思想开明的精明强干之士。他在《上大学士书》中写道：“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不绝于世而已。”他认为，一个衰败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缺乏人才，“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闾无才工，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阻，蕝泽无才资，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龚自珍的“君子、小人”观虽然不一定正确，但确定勾划出了封建高压政策下的死沉局面。对于任何试图有所作为的人物，封建统治者都极尽迫害之能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必欲置之心灰神灭之境地

而后快，龚自珍对于这样可耻的行径给以猛烈的抨击。在《病梅馆记》一文中，他把受尽凌残的“士人”比作病梅，指出，人们现在把梅树的曲折疏散的病态看作婀娜多姿，为此不惜大动刀斧，这是多么令人哀痛呵。他发誓要为病梅除去束缚，移之于地，使其自由自在地生长。

龚自珍不同凡响的人才观，他对封建政治制度的尖锐批判，使他成为近代思想史上的杰出人物。有人指出：“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足公开之。”龚自珍的思想对于后来之维新、革命志士都有很大影响。梁启超曾说，初读龚自珍的文章，就象突然触电一样，精神为之一振。

龚自珍学识渊博，他把自己的学问称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也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他认为研究学问要对治理国家有用处，所以时刻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为了抵御列强侵略，他致力于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对于西北地区尤为注意，曾专门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西域置行省议》。他指出：西北地区广人稀，经济落后，各种军备物质等等都要由内地辗转运往，跋涉千里，不仅劳民伤财，而且迂缓不灵，一旦边疆有急，难以为应。他提出利用边疆地广人稀的特点，移民突边，以开发边疆作为保卫边疆之基。为此，他提出首先要在西北地区改革行政体制，设立州县，以便统领，并为此拟定了具体计划。

他研究过经济问题，注意过生产的发展，写过重要的经济文章《平均篇》和《农宗》。前一篇反映他早期的经济思想，在财产分配上，要做到富者不太富，贫者不太贫，求得大致的“平均”；后一篇则是反映他关于农田土地分配与宗法制度方面的重要思想，反对王室、大官僚集团利用政权力量兼并土地。为了这些问题，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冥思苦索，考虑如何探讨和选择经世治国的方法，用以贯通古今世事的变化，安定人民的生活。他曾建议兴修江苏、浙江之间太湖流域的水利工程；也曾提出多植桑，多养蚕，以发展民族经济。

他考虑最多的问题，莫过于禁止鸦片的输入和如何巩固东南海防和西北边塞的安全了。为此，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研究东南海域的地理知识，并专门写过《罢东海番船议》的文章。他特别注意到17世纪以来沙皇俄国蚕食中国北方领土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移民西北、巩固边防的建议。他还敏锐地指出英国名义上同中国做生意、搞贸易，实际上是为了侵略和掠夺；于是大声疾呼，对于这个“拒之则叩关，押之则蠹国”的“巨诈”之邦，国人必须要张大警惕的眼睛！龚自珍的这些精辟见解，在当时真可以说是独具慧眼了。

支持禁烟

龚自珍有几个志同道合、引为知己的朋友。他们是林则徐、魏源，以及诗人张际亮，还有为人比较刚正的黄爵滋、汤鹏等。他们都是很有学问而性格坚强的人。龚自珍同他们声气相通，过从甚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据说，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他们曾在京城以诗会友，结成宣南诗社，相互应酬唱和，激励诗情，切磋琢磨，交流学术思想。诗友们都是极力主张要禁止鸦片输入，抗击英国侵略的有力人物。在禁烟抗英的问题上，这些人更有

说不完的共同语言。他们都以救亡国存为己任，砥励磋商，安危与共，表现出昂扬的爱国精神。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 17 年，龚自珍就洞见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阴谋。他尤其憎恨英国商人明目张胆地把鸦片输入中国。他把鸦片称为“食妖”，即食物中的妖魔；指出由于“食妖大行”，使人民“病魂魄，逆昼夜”，使国家“丧金万万”，财源枯竭，他还注意到鸦片对清王朝官吏的毒害，写下了“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的诗句，维妙维肖地勾画出官僚们的吸食鸦片的丑态。

龚自珍深知鸦片对中国人民的危害，所以，他大声呼吁：“食妖宜绝”！他全力支持林则徐禁止鸦片烟的运动。1838 年底，当林则徐奉旨驰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闻讯无限欢喜，提笔写出《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为林则徐禁烟献计献策，希望他“宜以重兵自随”，并要他多带能工巧匠，以“整修军器”；同时，龚自珍还表示愿随他一起南下广东，为禁绝鸦片贡献绵薄之力。可是，由于朝廷内部的斗争相当复杂，林则徐自己也有难言的苦衷，对于龚自珍的南下要求，只能婉言谢绝了。不过，龚自珍对禁烟运动的全力支持，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确实给了林则徐很大鼓舞，龚自珍那种渴望参加反侵略斗争的急切心情，在他后来怀念林则徐的诗篇中，得到了更加生动而又深刻的表现：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藏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诗的大意是：我的老朋友新近被任命为横海将军，他侧足而立，辛勤战斗在南方的广东，禁烟没有结束，大功尚未告成；我有一篇向他陈述战守计策的文章，可惜没有办法把它寄去，真是白费了这篇不寻常的文章呵！这首诗具体而深切的抒发了诗人坚决支持禁烟，渴望亲临前线的战斗豪情。

诗先人到

1839 年为己亥年，48 岁的龚自珍，由于“好直言”，“欹斜谗浪惊四座，即此难免群公瞋”。因而受到官僚排挤和打击。他曾作诗描述自己受到冷遇的情况：“十年不见公与侯，亦不见九州一刺通，南邻北舍谁欵相过从？痾瘵丈人石户农，嶷崎楚容，窈窕吴依，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拓者溪僮。”龚自珍在京郁郁不得志，于是，他以父母年事已高，须侍奉双亲于晨昏为由，辞去官职，南下归乡。

10 月，他又北上接回家眷。在南北往返的途中，特别是 5 月单身南归，一路上，走走停停，各处看看，遇事想想，他的创作获得了很大的丰收，光诗就写了 315 首，都是七言绝句。因为是在己亥年写的，所以他把这些诗编集在一起，命名为《己亥杂诗》。这组诗，记录了行程 9000 里的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还有对往事的回忆，他抒发的深沉感慨和忧愁，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世行将灭亡的清王朝的社会风貌。据说，在南归途中，诗人尚未抵家，而他在归程中写的一些诗篇，已先传到家乡了。所以就有“诗先人到”的传说，被人传为美谈。

那首“风雷”诗的写作，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一天，辞官南归杭州的龚自珍，到达江苏的镇江城，正遇上赛神会。在人山人海之中，这位当代的文坛大师，由于他那“广额嶷颐，戟髯炬目，故衣残履”的不同一般的外貌，

非常引人注目，他终于被一个熟人认出来了。诗人到镇江的消息一传开，忙坏了主持赛神会的道士，他们立即慕名而至，盛情邀请他为赛神会写一篇祭文。一向慷慨豪放，有求必应的龚自珍，欣然允诺，心情激奋，稍一沉吟，挥动如椽的大笔，酣畅淋漓地写下了“风雷”诗。这首诗确实写得好，写得妙。“天公”、“风”、“雷”都写到了，这是道士所需要的，完全符合赛神的要求；可它不是什么赛神会的祭文，诗人对“天公”、“风雷”都赋予新的涵义。它是一首振聋发聩的七言绝句，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人们所传诵。

启迪后人

龚自珍南归以后，迁居江苏昆山。在丹阳和杭州的书院里作过短期讲学。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也并不消沉。他的辞官南归，并不是一般人所谓的求田问舍，退隐山林，实在不过是换一个战斗地点罢了。他那不妥协的战斗锐气，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他继续用手中的笔挥写战斗的诗文，当别人以为他由于官场失意，可能从此一蹶不振而成为委弃于地的落花时，他却出人意料地引吭高歌：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尽管在夕阳西下辞京南归，不免有无限的离愁，但诗人并未悲痛欲绝，怆然落泪，而是以更优美动人的诗句，表明自己高洁的心迹：“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意思，落花并不是无情的东西，它化成春泥了，还能起护育新花的作用。诗人以此比喻自己虽然辞了官，仍然愿意为国家、社会尽最后的一点余力。他那为理想而斗争到底的决心，是多么坚强呵！

1841年，发动了鸦片战争的英国侵略军进犯江浙。闲居在家的龚自珍马上写信给地方官员，要求参加抗敌斗争，但因病未能成行。于当年9月26日，在丹阳地云阳书院，这位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和诗人，溘然与世长辞了，享年50岁。

“自古天才未尽才”。龚自珍留给后世的，有300多篇文章和近800首诗词，都辑录在《龚自珍全集》里。龚自珍的诗文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以大胆泼辣、笔锋犀利的政论，震惊当时的文坛。他虽自谦地称“但开风气不为师”，然而，他的诗文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确定都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代新风。他是揭开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第一页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以后的很多诗人和学者，都深受他的启迪和熏染。可见，龚自珍的诗文有多么强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

创榛辟莽 前驱先路

——魏源

鸦片战争的炮火，使古老的中华民族从自我陶醉的梦幻中惊醒，她慢慢地环顾四周，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了不屈不挠、曲折坎坷地向自强自立迈进的艰难历程。魏源，便是这一进程的少数先行者之一。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热心研究中国实际问题，成绩卓著的爱国思想家。他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并把清王朝的衰弱与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作了探索，提出了许多强国御侮的办法。他的爱国事迹和思想是很了不

起的。与林则徐一样，被人们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一位先驱者。

受嘱探“西事”

1841年8月一天黄昏，京口（镇江）城边码头上一对好友重逢了。一位是因中英战争遭贬革职，即发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另一个中年人就是魏源。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乡人，1794年4月23日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他从七岁起入私塾读书，学习十分刻苦，常常挑灯夜读；20岁的时候，离开家乡，随父亲来到北京。他拜许多学者为师，学问大有长进。特别有意义的是他结识了学识渊博的龚自珍，他们时常在一起切磋琢磨，越来越关心社会情况。

他生活的时代，封建社会已入末期，危机四伏，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这些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却给统治者以极大的震动，使其中少数有识之士开始面向社会现实。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魏源曾为镇压农民起义出谋划策。但这也使他比那些迂腐书生对社会的动荡有更深刻的了解，对社会的危机有更敏锐的感受。他一反有清一代士大夫流行的脱离实际、烦琐空疏、皓首穷经、埋头故纸堆的学风。他要补封建社会之“天”，要改革，提倡经世致用。在实践中，他逐步形成了改革政治的进步思想。

1822年，魏源考中举人。1826年，他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聘请，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在编辑这部清代政论文集的过程中，他仔细地研究了前人的著述，汲取合理的东西，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尖锐的批评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他大胆地认为被历代统治者，封建士大夫们视为正统的六经只是历史文献而已，不能成为万古不变的教条。时代不断变化，也就没有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法令制度要随时而变：“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后代要胜过前代，后人要胜过前人。他举例说，弹琴弹得好的并不看谱，善识好马的根本不按图索骥，所以，善于统治的人不拘于成法。当然，他是站在地方阶级的立场，要求革故鼎新，奋发自强。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那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氛围中，魏源的呐喊毕竟打破了一些顽固腐败的观念，吹进一丝新的气息。

35岁时，魏源在北京任内阁中书舍人，也就是内阁中掌写机密文书的官员。因职务关系，他便熟悉了清代典章制度，皇朝掌故，深入研究了各种典籍。他与龚自珍、林则徐、黄爵滋等友好结成宣南诗社，时常在一起饮酒赋诗，反复唱和，议论时事，探讨学问。不久，因父丧而至江苏。这期间，他积极帮助两江总督陶澍改革淮北盐政，筹划东南水利诸事。

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虽有经世致用、为民除弊的进步思想，但从思想总体来看，未超出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藩篱。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给进步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刺激，开始追寻中国挨打的原因，探索中国进步的道路。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开始逐步传输进来，在魏源的思想中，最可贵、影响最大，放出灿烂异彩的是他认真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首先提出要向西方学习来反抗西方的侵略，具有强烈的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思想。

1841年，当英军再次挑起战火时，魏源便投到临督浙江防务的钦差大臣裕谦的幕府工作，积极参加筹划防御。不久，林则徐被贬流放新疆伊犁。魏

源闻讯，在江苏镇江迎送林则徐。两人相见，百感交集，一吐衷肠。他们相互勉励，却又对未来忧心不已。魏源愤激地说：“林公，一年来的战局如此，令人愤慨。朝廷中当权者在大敌当前不作准备，战败后又缩手无策。御侮之道何在？救国之路何在？”

林则徐深沉地思索着。这一年多来的政局变化，不由他感慨万千。但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说：“这次我在广东抗英，深感洋人得势的重要条件是船坚炮利。要反侵略，我必须了解敌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接着，林则徐随手打开一个布包，捧出一大捆书报，交给魏源，并语重心长嘱咐说：“这是我在广东时派人从海外报上译辑的全部材料。如今我即将远去，不知何日才能返回，这些东西就交给你吧！望你能编写一种介绍海外各国情况的书，以使国人广开眼界，悟出御侮之道。”

原来，林则徐为了要抗击侵略者，很重视了解西方各国情况，派人从外国书报译辑有关情况。其中最著名的《四洲志》，是根据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辑的；《华事夷言》是英国人德庇时写的《中国人》一书的摘译；还有一种《各国律条》，是瑞士人滑延尔著的部分条文。这些材料对于了解西方各国的历史、政治、地理和现状，都很有参考价值。

这一夜，魏源和林则徐两人同宿一室，对榻倾谈。值此国家和民族忧患的重要时刻，互相勉励，消解胸中的忧思，砥砺爱国的志气。

魏源在年后写了两首诗，追忆了这次不平常的相晤。诗中写道：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
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戎图。
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鳧。
聚散凭令夕，欢愁并一事。
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苹。
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
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魏源的诗表达了他与林则徐之间的真挚感情。他珍重林则徐的委托，恋恋于仓促的聚散，欢愁交集，却又无适当语言可以告慰对方，而对国事依然忧心忡忡。

开眼看世界

千舶东南提举使，九边茶马驭戎韬。
但须重典惩群饮，那必奇淫杜旅獒。
周礼刑书周诰法，大宛首蓿大秦艘。
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

这是魏源的《寰海》组诗中的一首。大意是说：上千船只来东南沿海，有提举使把关中；西北九边茶马互市，是制约外旄的略谋。只须用严厉的法律惩办那些群饮的酒徒，怎么能以奇技淫巧为名，拒绝引进外国的器物。中国很早就有周礼刑书和周诰等法规，西域优良的大宛马、饲料首蓿草和古罗马大秦的商船，自古已来华和交流。想要学习西方技术和利用好的西方器物，最好的办法就应当选好办外交的能手。

魏源目睹鸦片战争失败，激起了强国御侮的爱国热情。他认为，“欲师

夷技收夷用”，这是最好的救国药方。于是，他在林则徐的启发下孜孜不倦地探索起来。

一天晚上，魏源下在伏案写作，突然有人来访，来客是两江总督裕谦的部下。

来客进门后，呆滞地望着魏源，一会儿，又失声痛哭。魏源吃了一惊，赶紧探问原因。

来客告知：定海、镇海已被英军占领，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英勇牺牲，裕谦将军力战不支，投水殉国了。关于浙江战事，魏源已听到一些消息。这是鸦片战争中壮烈的一役，尤其是定海守军与侵略者的浴血战斗更为壮烈。当魏源了解到，定海守军多半是以土枪、土炮以至刀矛、弓箭等简单的武器，与具有先进装备的英国作战时，万分感慨。他极为沉痛地说：“西方的枪炮比中国高明，以前在广东，今天在定海，都已被证实了，那种把西方技术说成是‘奇技淫巧’、‘形器之末’的见解，是多么可笑啊！”他还指出：不善于学习先进的东西，就永远落后、挨打。若在军事上研制先进的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在经济上学习他们的机器制造业，中国也能自强，就可以克敌制胜。他把这种方策称之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接着，他又向来客介绍了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编写一本介绍西方的书，记述海外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乃至宗教、文化等情况。目的是让中国人都能懂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道理。

魏源从书桌上拿起一叠文稿，指着向来客说：“这篇《英吉利小记》，就是我准备写的那本书的一部分，从中可以了解英国的情况。”来客认真地翻阅着《英吉利小记》感到很有兴味，又问魏源：“这情况你怎么了解得如此详细？”魏源微笑着介绍起来：那是1840年7月，定海第一次被英军占领，侵略者企图永久霸占定海，又筹划进攻内地，派出人员刺探军情，绘制地图。9月16日，英国一名官员安突德偷偷地到定海附近的青山岙测绘地图，被当地老百姓抓获，扭送交宁波知府衙门。一个在知府衙门的友人，把此消息告诉了魏源。魏源立刻赶到宁波，亲自审讯安突德。安突德详细地回答了英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情况，对侵华意图以及兵力部署、武器性能等也尽可能作了交代。审讯的结果，使魏源得到了关于英国的大量资料。他以此为基础，旁采其它见闻，编写成《英吉利小记》。

讲完这段经历，魏源说：“我要写的叫《海国图志》，与前人所写的著作有很大不同；过去那些书，都以中国人的见闻谈西洋，我则是根据西洋人的著述来谈西洋。这就对西洋的了解更广泛、深刻了。”

来客走后，魏源的心久久地难以平静。他眼前仿佛呈现一幕幕正在用简陋大刀、长矛与用先进武器装备的侵略者浴血拼杀的悲壮场面；耳边似乎传来那些饮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达官贵人胡说西方先进技术是什么“奇技淫巧”的轻蔑笑声。他想到了明代朱纨说过的话：“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如今要反侵略，实在更需要扫除那种愚昧和虚夸，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呵！

奋笔著新书

英国侵略者攻占定海后，又溯长江进攻，直指镇江、南京，一时海防警报急如星火。

正在扬州忙于写作的魏源，看到了腐败的清政府软弱无能，他郁积在心中的感触转化为愤怒，决定暂时放下《海国图志》，把以前写过的文章先进整理，编写一部歌颂清代武功的历史书，借以激励人心，振奋士气，抵御外侮，并联系朝廷中当权者的妥协投降活动，鞭挞那些主张屈辱求和的达官贵人。

在清政府屈服于城下之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魏源终于完成了《圣武记》。这部书约40多万言，讨论了海防、战争、练兵及筹饷等策略，这是他推求盛衰之理、筹划海防之策的精心之作。

一年后，魏源来到战后的南京，漫步秦淮河畔，登上朱雀桥头，满怀对侵略者的仇恨，写出《秦淮灯船引》的长诗。诗中列述了英军从长江口长驱直入，占圉山，破镇江的侵略罪行，揭露了妥协投降势力退让求和的丑恶嘴脸。

著完《圣武记》后，魏源又继续撰写《海国图志》。1843年初的一个早晨，魏源写完了最后一页。这是他深思熟虑、呕心沥血之作。他怀着激情写道：“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

《海国图志》五十卷，凝结着魏源的爱国思想，作为当时东方各国人民了解和抵抗西方的第一流的宝贵典籍，就这样诞生了。

在西方的船坚利炮面前，魏源感到以前的经世致用思想太软弱无力了，而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伦理经义也一筹莫展，必须面向海外。他在这部书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他不象一些顽朽的士大夫那样，从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昏聩自大的眼光来看“化外”的“蛮夷之邦”，而是向人们宣告，闭关自守时代已告终结，而今进入海国时代。他描绘自己的工作为“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痛定思痛，追根寻源，找战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必然结果，“养痍于数十年之前，溃痍于设巡船之后”。坚决反对妥协投降的“羁縻”政策，指出侵略者贪得无厌，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希望统治者能“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

他激动地写道：“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要愤发图强，反抗侵略，应该去伪饰，去昏聩。正是这种昏噩麻木、昧干世事的颠顶官僚和崇尚虚文、满口诗云子曰的学风导致了国家的虚弱，战争的失败。如果不进行内部改革，不讲求实效，是难以虞胜侵略者的。他还认为民气可用，主张训练士兵水勇，反抗侵略者。

魏源看到侵略者凭着“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些“长技”来侵占中国，认为中国也要学这些“长技”，方能反抗侵略者。他提出要设翻译馆，广译外国书目。建船炮局，学西法造炮。这在当时却是骇人之论。许多顽固派坚持认为除中国外的一切都是“蛮夷”，机器是“奇技淫巧”，有伤中国伦理道德，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是抵御侵略之本，而西方先进机器只是“形器之末”。魏源针锋相对反驳道：“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西方各种机器都是有用之物，为什么就不能用呢？他充满信心地相信，只要能向西方学习，则“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优西海之民”。

在经济上，他也有一些变化，产生一些新思想，由从前的“除弊”而转到此时的“兴利”了。他提出应允许民间开采银矿，以增加国家财富。还主

张改进币制，“仿铸西洋之银钱”。难能可贵的是，他力主反侵略、反对鸦片贸易时，仍主张通过正常的外贸来互通有无。他打破“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陈腐观念，坚决反对顽固派闭关锁国的愚蠢政策，主张进口洋船、洋炮、火器等工业品，以富民强国。他进一步主张自己设厂制造工业品，“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以于此造之”。他甚至提出凡“沿海商民，有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在当时，能提出这些主张是有一定的远见和胆略的。

近世倡先声

1844年，美、法垂涎英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浦条约》，其他各国也纷纷接踵而来，获得了英、美、法所享有权利。目睹西方列强侵犯中国更多的权益，吮吸中国人民更多的血汗，魏源希望中国独立富强和“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日益强烈，并深感《海国图志》五十卷本的不足。于是，他广泛收集材料，对此作了增补。增补的内容大多是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介绍，如火轮船、地雷、攻船水雷、望远镜等等器械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并附更多的插图，以便了解、制造和使用。魏源希望人们学会这些先进科学技术，能够自己制造船炮，自己使用新式武器，加强国防，抵御外侮。

1852年，魏源将《海国图志》增补成一百卷。百卷本《海国图志》增补了新发现的外国史地情况，并大量介绍了美国、瑞士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体。魏源称赞美国的宪法“可垂奕世而无弊”，把“至于朝纲，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誉为“西土桃花源”。这个百卷本，反映了魏源已看到。西方国家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比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进步。

鸦片战争后，沙俄趁清政府日益腐败衰落，企图吞并中国的黑龙江地区。沙俄的这种侵略野心，魏源早就有所警惕。1823年，他在防守古北口的直隶总督杨芳家当教师时，就开始研究古今边疆防务和西北地理。面对沙俄虎视眈眈的扩张野心，而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情况，他十分怀念和向往秦皇、汉武帝时能重用边防将长，国威远震西域的强盛景况。1844年，他重游长城，写下这样一首诗：

读史筹边二十年，撑胸影子是山川。

梦回汉使旄头外，心在秦时明月先。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阅读历史书，筹划边疆防备20年，充满着心胸的影子是祖国的壮丽山川。梦里常常回到比汉使征途更远的地点，心中比古人写“秦时明月”时更焦急如焚。魏源在这里表达了保卫边疆，北御沙俄侵略的迫切心情。由于对沙俄的侵略野心有警惕，所以魏源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特意记下林则徐1850年所作的论断：“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提醒人们要防备沙俄侵略之患。

《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的一部启蒙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进步思想家，取得了自强御侮的爱国主义的新方向。书，不胫而走，受到先进人士的欢迎和好评。积极主张改革政治和发展工商业的王韬，称它为“近来谈海外掌故”的“嚆矢”，并极赞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实倡先声”。康有为在游历香港后，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而回过头来探索本末，再次阅读《海国图志》，并把它作为讲西学的基础。

1850年，《海国图志》开始传入日本，德国人郭实腊、英国人威妥玛也分别摘要向西方介绍。1851年到1852年间，日本翻刻成风，在短短几年中就达22种之多。许多迫切需要了解西方情况的日本思想家纷纷争读，并把它奉为“海防宝鉴”。《海国图志》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有的研究者指出：“幕府末期一些进步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得的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有些人的思想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可在中国，直到1860年还没多少人重视此书。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人们才逐渐重视起这部书来，认识到它的价值，从中汲取启蒙的思想营养。

1850年，魏源曾任高邮知州。当太平军抵扬州时，他曾组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他无法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1857年，魏源孤寂地病逝于杭州的僧舍。他是诗人，留下大量的诗篇；他是经学家，写下精湛的学术著作；但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启迪了一代人为中国的富强而奋斗。

三元里群起抗英

林则徐被革职后，投降卖国的琦善任钦差大臣，他一到广州，便刁难抗战将领，削弱海防力量，牵制反侵略的战斗。而对英国侵略者却百般讨好，乞怜求和，与义律秘密签订《穿鼻草约》，私许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600万元等条款。

琦善的卑怯求和，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浙江镇海爆发1000多人的请愿活动，反对满清官员从镇海撤退守军，定海居民纷纷内渡，控诉英军的暴行，要求收复领土。广州各阶层人民在得知英军根据《穿鼻草约》占领香港后，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收回香港，痛剿敌军。

道光皇帝为了挽回“天朝”的体面，决定对英宣战，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调各省绿营兵1.7万人，前往广东作战。奕山无能，5月21日至27日一共打了7天，以1.7万人之师，却对付不了2400名英军，最后的广州城头竖起白旗。奕山接受义律提出的5项条件，订立《广州和约》，和约规定：交付英军赔偿损失费630万元。清军退驻广州城外60里，钱交清后，英军归还炮台，退出虎门。儿戏般的广州战役，以和约的订立而告终。

英军占领了广州城北的泥城、四方炮台等地，英军头子义律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纵容英国侵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行凶作恶，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广州城北的一带乡村，民不聊生，鸡犬不宁，成了鬼域横行的地方。在强盗、邪恶面前，清朝统治者奴颜卑膝。而广大人民与此相反，奋起进行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群众自发进行的第一场勇敢的反侵略战斗。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5里，邻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庄。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四方炮台的十几个英军士兵窜到了这里

进行抢劫，在村子里发现一个青年妇女，就一拥而上，围住胡搅蛮缠。村民鸣锣告警，群众对于英国侵略者的所作所为早已恨之入骨，对于当时发生的事情更是气得咬牙切齿，青年菜农韦绍光悄悄地招呼了几个乡亲，趁那伙强盗不注意，冲了过去一阵痛打，当场打死8个英军，其余见势不妙，连滚带爬狼狈而逃。

韦绍光把打死的英军尸体处理掉，然后对乡亲们说：“洋鬼子被我们杀了。他们一定要来报复。我们只有抱成一团跟他们干，才能保卫我们的家园，免遭其害。”乡亲们一致同意韦绍光的看法。于是就商量怎样抗击英军的报复。因为韦绍光有一身好武艺，为人仗义，在乡亲们中间威信很高，大家就选他当为首领。愿意听从他的领导。

韦绍光派人把村里的老人、妇女、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把15岁到50岁的男人召集到村北的三元古庙前集合，组织成立了“平英团”。决定以庙中祭神用的黑底白边的“三星旗”为“令旗”。带领大家宣誓：

“旗进人进，旗退人退，为民除害，死而无怨。”

同时又联络附近103乡的乡民，派出代表聚合在一起，共同商量部署战斗。会上一致决定：一是以“三星旗”为总指挥旗，各乡自成一个作战单位，备乡旗一面，推举领队一人，指挥作战；二是以鸣锣为号，一乡鸣锣，各乡皆出动；三是一有敌情，15岁至50岁的男子一律出动。

由于广州城北各乡人民深受英军之害，群情激愤，犹如泼了油的干柴，一加点燃，便会熊熊燃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迅速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抗英武装力量。这支队伍中有打石工，纺织工、渔民、盐民，也有爱国士绅和有功名的知识分子，而其中的贫苦农民人数最多，是这支队伍中的主力军。

他们研究具体歼敌的方法是：把七、八千名武装群众预先埋伏在丘陵起伏的牛栏岗附近，然后诱敌深入，围攻歼灭。

1841年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义勇队5000人，手拿锄头、铁锹、鸟枪等向英军驻扎的四方炮台进攻。正是早餐的英军，发现遍野都是手持劳动工具和原始落后武器的队伍，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卧乌古除派一军官领少量士兵留守炮台外，亲率1000余名官兵，带着新式枪炮，气势汹汹地向义勇队扑过来。平英团的义勇军毫不畏惧，也不正面接仗，只是用鸟枪轰击几下便马上后撤。英军的火力也打不着义勇军。这样他们边战边退。这可把英军司令卧乌古惹恼了。他下令英军猛追过来，义勇队按原定计划迅速向三元里以北撤退。路越追越远，前面是片稻田，稻田间的路径又窄又滑。英国军只能把队伍拉成单行，笨重的大炮也不能随军前进。

英军司令卧乌古率大队士兵追赶平英团的群众时，先派出一队士兵在前方开路。他们每人都自配长枪、短枪、腰刀、匕首。当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英军追赶到三元里附近的唐夏村口时，突然发现前边的树林里出现了一面“三星旗”，有十几个乡勇时隐时现。英军追了过去，追到近前，忽然发现右边树林里也出现了“三星旗”和十几个乡勇。不一会儿又有几个地方出现同样的情况，英国兵东追西赶，道路不熟，追又追不上。不追时又有义勇杀来，他们个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胆战心惊。

这些跟英军“泡蘑菇”、“捉迷藏”的乡勇，是一个叫颜浩长的青年率领的乡勇小分队。后来英国兵追到了一片开阔地前，这片开阔地杂草丛生，看上去平坦极了。他们正在查看，忽然听到开阔地对面有人说笑，一瞧，正是刚才“戏弄”他们的那些乡勇。英军认为这地方可是他们发挥武器优势的

好地方。于是不顾一切的冲进开阔地。这可中了乡勇们的计，原来，这片开阔地是一片烂泥塘，表现上长满浓密的杂草，底下却是些烂泥。人一踏上去，就要陷在烂泥里，而且越挣扎就陷得越深。这伙强盗就这样一个个陷进了烂泥塘。

1000 余名全副武装的英军在卧乌古的率领下，追到牛栏岗时，平英团的勇士们停止了撤退。卧乌古此时也觉察到形势不妙，下令英军撤退，但为时已晚！一声锣响，埋伏在牛栏岗的七八千名武装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喊杀声震荡山谷。英军慌忙开枪还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英军突围，平英团的勇士们立即从两边包围了英军的后队，迅速地冲上前去与英军进行肉搏。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短兵相接，使洋枪失去了优势。下午一时，老天也像是专门惩罚强盗似的下起了倾盆大雨，英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士气低落。田间的小路被暴雨淹没，稻田一片汪洋。穿着皮靴的英军，在泥泞中寸步难行，一个个像笨拙的狗熊。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与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平英团的勇士们精神抖擞，愈战愈勇，士气高涨。中国人民以其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浩然正气，用原始落后的武器——长矛、大刀刺杀英军，英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惯用洋枪战斗的英军用刺刀与惯用长矛和大刀的中国人民肉搏，刺刀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可怜的防御物。没有参加战斗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担饭送茶至前方，儿童也赶到前来喊杀助威。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数万人三元里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 50 名，缴获大量战利品。大大地灭了英军的锐气，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威风，人民热情赞颂这一仗是“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

被围英军如丧家之犬狼狈窜回四方炮台。平英团又立即包围了四方炮台。31 日上午 9 时，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程、增城、花县、平县义勇数万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炮台外旌旗招展，刀矛如林，杀声震天。炮台内英军龟缩，等待援救。英国侵略军头子义律率兵前来，也被围困。他们立即派奸细混出重围，带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要求义勇必须立刻散开，否则英军将解除和约，继续攻城，烧掉附近每个乡镇。被英军吓破胆的奕山立即派余保纯出城替英军解围。

余保纯带领南程、番禺县令前往，打躬作揖央求群众撤围。群众恨透了这个软骨头，骂他“通夷卖国”。余保纯对群众无计可施。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说：“如果乡民不退，将来万一有事，要由你们负责。”士绅们经不起余保纯一吓一压，有的丢下群众就走，有的劝散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发的反侵略的斗争被卖国的清朝官员和动摇的地方士绅们破坏了。围攻炮台的群众暂时分散，英军狼狈逃走。6 月 1 日，英国侵略军全部撤退到虎门外的海滩上。英军头目义律竟恬不知耻地发出告示、要中国人民“后毋再犯”。三元里人民立即贴出告示，痛加驳斥，并警告侵略者：你们若敢再来，我们“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否则“便非顶天立地男子汉”。这是一部充满爱国义愤和英雄气概的反侵略的战斗檄文。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甘心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奴役，勇于斗争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显示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巨大力量。

血溅定海 浩气长存 ——三总兵为国捐躯

1841年英国政府接到义律关于同满清政府订立《穿鼻草约》的报告后，对义律很不满意，认为义律没有完成交给他的侵略任务。决定撤换义律，改派在印度干了40年侵略勾当的璞鼎查为侵华“全权公使”。并指使璞鼎查，如果清政府不完全无条件地答应英国提出的要求，就决不能停止军事活动。

1841年8月，璞鼎查来到中国，率领海军司令巴尔克少将，陆军司令卧乌古少将，以及军舰30多艘，陆军3500人进犯厦门，遭到清军的激烈抵抗，清总兵江健芸力战牺牲，厦门陷落。9月英军北犯定海。又遇到更加顽强的抵抗。

守卫定海的是清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和前来增援共同防守定海的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

定海是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临海的城市。环山的三面易守难攻，但临海的南面，地势平坦，伸向大海，易攻难守。而定海位于浙江舟山群岛，是中国南北海防的中间连接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军曾进犯定海，由于守军事先没有准备，于1840年7月6日被英军攻陷。当时正有家中服丧的葛云飞接到浙江巡抚华尔恭额的信后，为国土沦陷心情沉痛，立即奔赴前线参加抗英战争。在定海人民的协助下，抓获了在定海附近测绘地图的英国军官安突德及其仆役。在葛云飞的统一布置下，三总兵靠中国军队的威严和中方释放俘虏、英方交出定海城为条件收复了定海。

收复定海后，三总兵深知侵略者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旦有机可乘，必然会再来侵犯。因此，他们回到定海后，就修复了旧有的炮台和被毁坏的城墙，又在面临大海的城南空旷平坦的地带修筑了一道防御土墙。他们还提出熔炼钢铁制造大炮，在定海城背后的晓峰岭增设炮台，都因清政府不拨给经费和投降派的破坏而没能够实施，致使定海城仍然是易攻难守。三位总兵进驻定海后，葛云飞请王、郑二位总兵驻在城内，自己领兵驻守在城南丰塘土城第一线最重要的阵地。三位总兵精诚团结，共同对敌。厦门失守的消息传到定海，时局紧张，王、郑二位总兵要求出城守卫阵地。三位总兵经过研究决定，分兵把守要隘。城西山间有一条险道，直通定海城内，由王锡明率军防守；城西南是敌人入港的必经之地，由郑国鸿率军队把守。三位总兵同心协力，决定与定海生死与共。

1841年9月，英国新任侵略军头子璞鼎查率领战舰29艘，侵略军2000多人，再次进犯定海。26日上午，海上哨兵发现冒着黑烟的敌舰队向定海方向开来。面对英军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三位总兵立即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接着向全军将士发出了战斗命令，还当众宣誓：“与城共存亡，不离定海半步！”

下午1时左右，璞鼎查亲率两艘战船，窜入城西南沿海港湾，窥视地形，战船还未进入内港，就遭到定海守军的猛烈炮击，顿时，一只英船的桅杆被击断，吓得侵略军仓皇逃出海湾。

27日上午，英军又乘夜色朦胧，以火轮船3只，桅船1只向定海城南土城一线进行炮击。守卫在这里的总兵葛云飞当即指挥中国守军发炮还击，双方激战到中午，英国死伤400余人，始终没能靠岸，只好狼狈地退回海面。

正面的一次次进攻都被英勇的中国守军击退。狡猾的侵略军 28 日又绕向城西，妄图用炮火摧毁西面山头阵地，从西面越山入城。在此防守的总兵王锡朋指挥士兵，利用山上的岩洞作隐蔽，当敌人进行炮击时，防守的士兵躲进岩洞，当敌人开始登山进攻时，又突然给敌人猛烈的还击。这样中国守军用落后的武器，却杀伤了大量的敌人，阵地屹然不动。29 日拂晓，敌人的侦察部队又从西南沿海地区登陆。守卫在这里的士兵在老将郑国鸿的亲自带领下，用猛烈的炮火把上了岸的侵略军赶下海去。

30 日上午，英军出动更多的兵力，同时从城西、城西南发起猛烈的进攻。中国守军奋力还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这时中国守军阵地上的弹药快要打光了，一部分英军趁机攻破城西南沿海阵地登陆，形势十分危急。老将郑国鸿临危不惧，手持大刀，带领几十名亲兵杀人敌群，郑国鸿的精神鼓舞了其他士兵，士兵们也奋勇地杀向敌群，中国士兵在老将的带领下，又打退了英军的一次进攻，把他们再一次赶下海去。

战斗进行了 5 天 5 夜。中国士兵在三位总兵的领导指挥下，为了保卫国土，反抗侵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着英勇的斗争。他们面对的敌人，是武器精良，装备齐全的侵略军。而且船只人数在不断增加。英军的船队由开始的 29 艘增加到 40 多艘，人数由 2000 人增加到 2 万多人。而清军的装备陈旧落后，使用的武器是土炮，有的甚至是原始刀箭。守军的人数在战役开始前虽然增加到将近 5000 人。但由于战线较长，战地分散，彼此孤立无援。由于连续作战，给养供应不上，士兵们的吃饭都成了问题。9 月的定海，阴雨连绵，士兵们上淋雨水，下踏泥泞，饿着肚子，每天同英军战斗长达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战斗减员很多，敌我双方战斗力量的悬殊越来越大。形势越来越危急，三总兵急书镇海大营，请求派兵援助，言说若英军再次进攻登陆，寡不敌众，定海难守。浙江提督余步云是个贪生怕死的投降派，一开始他就主张放弃定海，认为中国水师同英国兵打仗必败无疑，守定海是下策。他的这一谬论开始就遭到了以葛云飞为代表的抗战派的严厉驳斥，此时见定海危急，余步云不但不给定海增加一兵一卒，反而说葛云飞等是小题大作，夸大其辞，是为日后冒功领赏。还威胁葛云飞不要想着援兵，若定海失守，就要拿你问罪。葛云飞等悲愤异常，但为了顾全大局，为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强忍悲愤，鼓励士兵继续英勇杀敌。

英国侵略军看到定海守军没有援兵，气焰更加嚣张，10 月 1 日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城西和城西南的阵地相继被英军攻陷，在苦战中，总兵王锡朋、郑国鸿以及士兵为国壮烈牺牲。城南的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但由于城西、城西南的阵地陷落。城南的阵地遭到前后两面敌人的夹击。侵略军蜂拥而至。在这最后的时刻，葛云飞率领活着的 200 名士兵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他手持大刀，高呼：“跟我来！”士兵紧跟着奋勇冲入敌军群中。葛云飞亲手杀死了英将安突德。这时英军从他的背后打来一枪，子弹穿过了葛云飞的胸膛……200 名士兵也和总兵葛云飞一样，壮烈牺牲。

英军虽然攻陷了定海，但三总兵所率士兵的英雄气概却震慑着侵略者的心。也鼓舞着中国军民的反侵略的斗志。他们为国牺牲，浩气永存，犹如青山常在，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和敬仰。义民徐保等人，乘黑夜从敌军阵地将葛云飞、郑国鸿的遗体抢回，在定海建立了“三忠祠”，以使后人永远纪念他们。

镇海抗英永世流芳

——裕谦

1841年10月1日，定海再次陷落。一时英国侵略军的气焰更加嚣张。不久，又集结40多艘船舰于镇海附近洋面。波汹云紧，战斗的风暴日益逼向镇海。

驻守镇海的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蒙古镶黄旗人裕谦。裕谦（1793~1841）出生在一个历代显贵的蒙古族官僚家庭里。24岁中进士，历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江苏巡抚等职，后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生性耿直，疾恶如仇，对投降派恨之入骨。他曾上奏道光皇帝，历数卖国贼琦善的种种媚外乞降的罪状，慷慨陈辞，进行弹劾。在裕谦等抗战派官员和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道光皇帝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裕谦还曾对伊里布在任两江总督时与英军勾结的罪行拍案而起，如实地揭发了伊里布和他的家人张喜与侵略军私相往来，私自接受英军礼品的勾当。使这个与侵略者勾结的汉奸被革职发配。

裕谦对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人士怀有诚挚的感情。他同林则徐一直保持多年的深厚友谊，十分敬佩林则徐的爱国言行。在林则徐无辜受到贬谪，处境艰险的时刻，裕谦挺身而出，伸张正义，毅然上奏道光皇帝，大胆称赞林则徐是兵民所悦服、外敌所畏惧的好官，公开挽留他和自己一起在浙江抗击英国侵略者。裕谦非常重视人才，林则徐曾经积极向他推荐爱国思想家魏源。他慧眼识人，当即将魏源聘为幕僚。在朝廷腐败，投降派占上风的时期，裕谦敢于举荐贤能，实在是难能可贵。他曾斩钉截铁地宣称：“要之中国威者，皆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奸佞之辈，虑久远者，皆忠义之臣，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流！”在裕谦的心目中，爱国与卖国、抵抗与投降、智勇与庸懦、光荣与耻辱，泾渭分明，不容混淆颠倒！他胸怀祖国，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仗义执言，被当时的爱国人士赞誉为足以为祖国建树功勋的“凌烟将种”。

裕谦为了加强防务，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充实兵员时非常注重新招士兵的素质。他在浙江沿海一带广泛张贴告示，大力招募膂力过人，手举数百斤者；能换强弓，箭不虚发者；善放鸟枪抬炮，致远有准者；使用长矛及各种军器，飞舞矫健者；能起墙逾沟，至数丈外者；拳棒精熟，一人能胜数十人者；熟识海洋风云沙线，善于操舟，出没风涛者；能泅水潜伏江海者等八类精水骁勇，技艺高超的能人力士。他还明确宣布：“凡是出色合格的人材，不拘原籍是本省还是外省，从前有无过犯，一概可以留营效力，此后果能奋勇立功，还将分别奖报，以示鼓励。”为了激发群众抗击英军保卫祖国的高昂斗志，裕谦多次发布告示，历数英国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严正指出他们无恶不作，实属难容，神人共愤，号召沿海人民，英军一旦侵犯需同心共讨，奋力痛杀。他还悬出重赏，对杀敌有功人员从优奖励，制定了明确优厚的赏格。对前来报功的人，经查验属实，立即不折不扣地照格给赏。在裕谦的激励下，浙江沿海广大群众深明爱国大义，人人踊跃，自备钱粮，组成乡勇团练。男、女老少齐上阵，截击捕获潜入海滩的英军士兵。组成乡勇团练。男、女老少齐上阵，截击捕获潜入海滩的英军士兵。阻击驶到近海的英国舰船。在漫长的浙江海岸线上，激起了一股杀敌立功的热流。

裕谦对那些为贪图厚利而出卖灵魂，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深恶痛绝。对

长期在英国舰船上充当汉奸的布定邦；在定海为英军搜集情报的虞帼珍；替侵略者书写反动告示的郁秀饮等人，毫不手软，一经发现，立即将他们捉拿归案，斩下首级，沿海边城镇，巡回示众，宣布他们的罪状，揭示他们的可耻下场。他还专门发表了文字通俗的告示，指出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到时候连老婆孩子都要受牵连。这些措施对镇压汉奸，巩固海防，分化瓦解敌对势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懦夫屈膝偷生，勇士舍身救国。身为文职高级官员的裕谦，犹如即将冲锋陷阵的猛士，磨拳擦掌，准备战斗。从1841年2月到10月的七、八个月里，不论是月黑风高的夜晚，还是海水咆哮的白昼，裕谦一直严密地注视着沿海的局势。为加强海防，他一直马不停蹄，不辞劳苦，奔忙在海疆前线，筹划防务。他还多次向道光皇帝上奏折，提出一些建议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海防，对防御英军进犯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英军的侵略暴行，裕谦怒火填胸，大声疾呼：英国侵略者攻陷我城池，蹂躏我居民，凡有血气者，自当同仇共愤，思饮其血，食其肉，寝其皮，英军胆敢再犯，正好大加剿洗，断不能任其一人还！

英军集结兵力于镇海附近洋面，一时黑云压城，裕谦给道光皇帝上奏，请求转令靖逆将军奕山发动进攻，以牵制英军，配合防守镇海。这是很得当的战略部署，但每月耗费30万两白银，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奕山，借口“守为上策”，以图临战脱身。使裕谦的正确建议遭到无理拒绝，孤立无援的镇海形势异常严峻。

整个镇海城笼罩在临战前的紧张繁忙的气氛之中。在大本营中，裕谦冷静地思考着：侵略军加上汉奸，总计不下万人，敌众我寡。而英军又刚攻陷定海，气焰十分嚣张，我方军士大多数又没有经历过战斗的考验。局面万不可轻视啊！当务之急是必须赶快缜密部署兵力，迎接战斗。裕谦果断地下令，由浙江提督余步云带领几千官兵驻扎在招宝山上，翼长狼山镇总兵谢朝思和江苏候补知府黄冕带领两千官兵扼守金鸡山。招宝山和金鸡山地势险要，是镇海的前沿阵地和制高点，对镇海的防守至关重要。裕谦本人则率少数部队坚守在镇海城里。同时又从江苏、江西两省飞调尽可能多的兵力，命令他们昼夜兼程赶来以加强镇海城的防务力量。

把所有的兵力布署停当，然而援军未到，兵力太少，英军扑来，镇海城还是很危险的。裕谦明知处境凶险，但他立志已定，决心与侵略军血战到底，以死报国。为了提高士气，裕谦举行誓师大会，他庄严宣布：“……文武将佐，敢有受夷一纸书去镇海一步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当前，只有竭尽血诚，与敌死战，断不能以为兵力单薄，而要求退守，离开镇海半步，也决不能以保全人民生命财产为借口，而同敌人书信联系，谈判议和。裕谦慷慨陈词，声色俱厉，情绪激昂，使广大爱国官兵受到极大的鼓舞，士气大振。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枕戈待旦，纷纷表示：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誓与镇海共存亡。

裕谦抓紧战前的时机，下令将所有机要文书立即送往后方的嘉兴行馆，妥为保存。同时还及时地遣散了身边的“幕客”。分别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叮咛道：“你们都到西城几里以外去，听我的捷报。如果不幸战败了，你们就撤退到余姚去，不要顾我。这次，英国强盗纵然能够暂时强占镇海，但他决不能长期占有中国的领土。”临危壮别，即将离去的人们聆听着裕谦的

深情嘱托，无限眷恋着这位胸怀祖国、坐镇危城、决心效命疆场的爱国将领。英军舰船 30 多艘逐渐向镇海逼进，闯进镇海蛟门，在笠山，虎蹲山一带往来窥视。1841 年 10 月 10 日凌晨，英国侵略军兵分两路，分别向招宝山和金鸡山发动了凶狠的进攻。在金鸡山上，谢朝思和黄冕率领守军奋勇拼杀，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歼敌几百名。从战斗一打响，裕谦就冒着敌人的炮火，登临城头亲自督战，他气宇轩昂、目光如注，指挥着官兵向英军猛烈开炮。在裕谦的激励下，士气高涨，战斗异常激烈。守卫招宝山的余步云却擅离指挥岗位，来到镇海城头，以保全千百万生灵为名，要求派人去英国军舰，向英军妥协求和。裕谦不加思索，断然驳斥说：“妥协投降不过苟且旦夕，况有伤国体。”余步云无话可说，只得告退。过了一会，余步云再次来到城头，不知羞耻地说：“我家有妻子儿女二十多口，实属可怜，要求投降。”裕谦斩钉截铁地回答：“儿女情长，英雄不免，但忠义事大，此志断不可夺。”裕谦的浩然正气，金石言词压倒了震天动地的枪炮声，威严庄重。余步云在爱国官兵睽睽注目下，像一条丧家的狗退了下去。

在裕谦的统帅下，战斗进行了一上午，英军也没有沾到什么便宜，一次次地进攻，一次次地败回，到处是侵略军的尸体。下午，英军又一次疯狂地反扑。余步云这个贪生怕死的无耻之徒，被敌人吓破了胆，竟不顾一切后果，带领队伍，临阵脱逃。招宝山沦入敌手。防守金鸡山的谢朝思、黄冕率领官兵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谢朝思和三百名爱国官兵英勇阵亡，金鸡山经过一番苦战，陷落敌手。两年制高点被英军占领，侵略军集中炮火，居高临下，猛轰镇海城。顿时，炮弹如雨，全城一片火海，成群的英军蜂拥而来，守城官兵拼死厮杀，可是敌众我寡，悬殊太大，镇海城已无可挽救。裕谦见大势已去，沉着地命令副将丰仲泰，立即护送钦差大臣关防去后方。尔后向正在遭受外敌蹂躏的祖国河山投下深情的最后一瞥。带着满面硝烟，浑身战尘，从容地走下城楼，大步迈向学宫，纵身跃进泮池，实现了他以死报国的誓言。残阳似血，照着一池淹没英雄的深水。千总马瑞鹏听到裕谦殉难，急忙赶来，泅水救出了这位宁死不屈、坚持民族气节的将军，将他放进小轿，护送出城。途中，因无法抢救，裕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人民敬仰这位蒙古族的爱国英豪，后来在镇海给他建立了专祠，作为永久的纪念。裕谦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他的忠烈正气堪为风范，流芳后世。英国侵略军仇恨他的忠烈，畏惧他的余威，曾悬赏 10 万金购买他的遗体。而人民在裕谦的壮烈殉难的地方——镇海学宫宫前泮池旁，立起一块石碑，石碑上镌刻着：“流芳”两个大字。裕谦的忠烈正气永世流芳，是鼓舞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伟大力量。

谁将战迹征新谏，一幅吴淞殉节图 ——陈化成

1842 年 5 月，英国侵略军进犯长江。吴淞首当其冲。当时驻守吴淞的是江南提督，66 岁的老将陈化成。

陈化成生于 1776 年（清乾隆 41 年），字业章，号莲峰，福建同安县人。他行伍出身，曾任金门镇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在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时候，就多次率领部下挫败英军的侵扰。深为当时的闽浙总督邓廷桢所器重。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企图突破长江口，控制大运河，以切断清政府赖以生存的

粮食运输线。此时，陈化成被调任江南提督，守吴淞口，督办江浙一带军务。

陈化成一到吴淞，立即勘察地形、修复炮台，添设炮位，挖设濠沟，建起了沿海 26 堡。同时，他还赶制火药，铸造大炮，训练兵勇，充实骨干，稽察奸细，储备军粮。整个吴淞口的防御能力从各方面大大增强了。

陈化成平时以身作则，爱兵如子，人称“陈老佛”。一个夏天的晚上，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潮水上溢，直奔陈化成的军帐。为安全起见，部将请求将军把帐移往高处。陈化成却说：“大帐一移，三军惊忧，而我就高燥，而士卒湫溢，于心何安？”当时裕谦探望他，只见他镇定自若地在原来的军帐中处理着军务，军营内处，铁序井然。

陈化成还与士兵一起操练，同吃同住。有的战士病了，他便亲自去看望。有一次冬天下了大雪，他便担心士兵是否受冻，第二天一早就到各处去视察情况，抚慰部下，并为士兵送去御寒的棉衣。而他自己病了，却显得无关紧要。曾经有一次，两江总督裕谦听说他患了痢疾，便派去医生为他治疗。他说：“栉风沐雨，军营常事，某以老惫偶疾，何独张皇？”于是谢绝了裕谦等人的一番好意。裕谦牺牲后，继任两江总督的牛鉴，听说陈化成生活十分俭朴，就派军需局每 10 天送白银 250 两。陈化成固不接受。

陈化成体察下情，对士兵关怀备至，但是打起仗来却英勇无比，对敌人毫不留情。人们称他“陈老虎”。他的名字威慑敌胆，声振八方。在英军中也流传着“不畏江南百万兵，唯惧一人陈化成”。

1842 年 6 月初，吴淞江口惊涛阵阵，战云滚滚，英国侵略者战船百余艘，援军万余人，横海十余里，准备海陆并进，攻打吴淞。敌军素闻陈化成勇猛，不敢贸然进犯。他们对吴淞观察了几天后，决定试探一下清军的炮力，于是趁大雾弥漫之机，派出 4 艘军舰，两舷布置上木头人，闯向西炮台。陈化成看穿了敌人的诡计，他稳坐炮台，未发一炮，使敌人一无所获，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敌人用木排扎上战书，让其顺江水漂到吴淞口炮台下，想用“激将法”诱清军开火，以试探清军火力。陈化成对战书扫了一眼，不屑一顾。随即，他吩咐上下厉兵秣马，严阵以待。

当时，吴淞口有东西两个炮台，互成犄角之势。每个炮台配以大炮，围以土堡，水面上还有船只巡逻。陈化成亲自坐镇西炮台，东炮台由参将崔吉瑞把守，东、西炮台的后面，有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布防小沙背，以防敌军迂回包抄。

1842 年 6 月 16 日，英军 7 艘战舰，6 艘汽船和几十只运输船一起压向吴淞口，向西炮台开始了猛烈的炮击。顿时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瓦砾横飞。陈化成不顾个人安危，挺立高处，手执令旗，指挥发炮。激战 2 个多小时，3 艘敌舰被击毁，5 艘敌舰被击伤，英军死伤 300 余人。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

英军不敢再从正面进攻，便狡猾地用小型舰艇开进西炮台南面的蕴藻浜，强行登陆，妄图从吴淞镇后面包抄西炮台的侧面。陈化成发觉了敌人的计谋，立即指挥军队奋勇抵抗。

关键时刻，往往偶然的一件事情能改变战局。两江总督牛鉴本是一贪生怕死、昏庸无能之徒。与敌军开战前，他曾对陈化成说：“英军船坚炮利，触犯不得，不如开门迎接，以后慢慢设法对付。”现在听说陈化成打了胜仗，他却想争功领赏。于是，他带着仪仗队，坐着轿子，招摇过市。敌人发现了前去观战的总督大人，一阵炮轰，吓得牛鉴慌忙窜出轿子，狼狈逃命，一口气逃过嘉定，到达南京！

牛鉴的溃逃，使军心大乱。驻守小沙背的王志元治军不严，曾受到陈化成的斥责。现在总督逃跑了，他也跟着弃阵脱逃，守卫东炮台的崔吉瑞紧随其后。敌人由小沙背轻易登陆，陈化成腹背受敌，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大敌当前，部将临阵脱逃，陈化成义愤填膺，他呐喊苦战，亲自点燃烧红的火炮，不顾身上多处受伤，血流如注！

敌人逼近了炮台，陈化成抽出腰刀，率领仅有的 81 人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最后在西炮台全部壮烈牺牲。

就这样，66 岁的老将陈化成为守长江的门户吴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高尚情操博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殉难后，当地人民冒险从阵地上背回他的尸体，安葬于嘉定。沿途人们罢市公祭，深表哀悼。当时诗人贝青乔有感于是，作诗一首：

“ 击碎重溟万斛舻，
炮云卷血洒平芜。
谁将战迹征新谏，
一幅吴淞殉节图。 ”

保疆土而安黎庶 不在一身之荣辱 ——姚莹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又号展和，安徽桐城县人。姚莹自幼家教严格。1808 年中进士，善以作文论事。1816 年为官福建，曾任平和、龙溪知县，3 年后调往台湾，1831 年改江苏任职，曾任元和、武进知县，高邮知州，淮南监掣同知，护理两淮盐运使。他认为“服官之道，当以谨慎为本，忠信为质”，“为政在于得民，而得民者必须与民同好恶”。因此，深得林则徐，陶澍等封疆大吏的赏识，认为他才可大用。鸦片战争前夕，国难当头，姚莹又被派往台湾，升为台湾兵备道，又加按察使銜。

天眼看世界

姚莹在清政府中属于有远见卓识的官乡。年轻时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注重现实生活，关心国家命运，与龚自珍、魏源等人交往甚密，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对当时西方各国的情况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他敏感地意识到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威胁，洞察到英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别有用心，因而坚决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斗争。

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坚定地站在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主战派一边，并积极地投入到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去。在保卫台湾的战斗中，他相信民心可用，使孤岛台湾全民皆兵，军民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在作战中，他一方面亲自调查情况，亲自审讯俘虏，搜集从敌船上缴获来的各种书信、图表、实物；一方面从其他途径继续寻找有关国外情况的书籍、报刊、地图、表格，进行分析判断，由于他知己知彼，耳聪目明，采取的一些防御办法切实可行，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致使敌人进攻台湾连连失败。

当对，他还尖锐明确地指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清政府对外界一无所知。在铁的事实、惨痛的教训面前，他向人们大声疾呼：“开眼看世界！”

保卫台湾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7月17日,英军开始进犯台湾海域。姚莹率领台湾军民早已做好了准备,进行严密的布防。当敌船驶进鹿耳门时,台湾水师的船队从北面出现,枪炮齐发,给了英国侵略者以措手不及的打击。敌船狼狈逃窜。就这样,鸦片战争中台湾保卫战的序幕拉开了。

敌人被我凌厉的炮火击退后,并没有放弃垂涎台湾的野心。姚莹也深知侵略者的本性,因此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短暂的平静预示着更猛烈的风雨,姚莹未雨绸缪,他向邓廷桢等提出“募壮勇以贴兵防”、“习火器以焚贼艘”、“造大舰以防攻战”、“雇快船以通文报”、“派兵勇以卫炮台”、“炼水勇以凿夷船”、“派委员以资防守”等七条防御措施,并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24处重要口岸全部设防。同时,还加强了巡视和督察,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加强了台湾的防务。

直到1841年7月,时隔一年的时间,英军才第二次进攻台湾。由于姚莹防备严密,敌人无隙可乘,敌船游弋了几日后,不得不返回。

1841年9月13日,敌军向鸡笼港(今基隆港)海岸开炮。在姚莹的指挥下,我军勇猛还击。炮火打断了敌舰的桅杆,敌舰失去了方向,撞到礁石上,敌人纷纷掉入水中,死者大半。在这场战斗中,俘虏敌人133名,击毙敌人几十名,缴获大炮10尊,给了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

英国侵略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10月19日,他们又向鸡笼港回来,并要以每个英俘支付100大洋的价钱,赎回全部俘虏。当敌军的阴谋不能得逞时,便向沿海口岸频频开炮。在姚莹的命令下,台湾守军向敌船进行了猛烈的炮火还击。姚莹还广泛地宣传、发动、组织群众,采取“家自为守,人自为兵”的措施,增强台湾的海防力量。台湾军民同仇敌忾,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骚扰和侵袭。

敌人的几次侵袭均遭失败,但他们仍不甘心。他们寻找我军防守力量薄弱的大安港实施重点进攻。大安港在淡水 and 彰化之间,表面上防备松懈,实则不然。姚莹对此早已料到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利用地利地形,周围埋伏重兵,然后派人假作向导,诱敌进入到暗礁林立的海边。当敌舰触礁搁浅后,伏兵对敌人进行了猛烈的轰击,打死敌军几十人,俘虏49人,缴获火炮13门,枪支弹药一批,敌人侵占台湾的野心又被粉碎了。

敌人“五犯台湾,不得一利:两击走,一潜遁,两破其舟,擒其众”。在姚莹及台湾军民的守卫下,宝岛台湾固若金汤。

忍辱负重

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对敌人奴颜婢膝,妥协投降。战功赫赫的姚莹为英人所忌恨,遭到了英国谈判代表璞鼎查的陷害。他说那些被姚莹俘虏、处决的英军是“遭风难民”,诬陷姚莹“冒功欺国”。再加上姚莹曾经拒绝闽浙总督、卖国贼怡良要他“送还敌俘”的无理要求,并始终同投降派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所以怡良那帮大耻小人便乘机落井下石,陷害忠良,道光皇帝明知是谎言和诬陷,却害怕罪洋人,战争再起,竟下令缉捕姚莹。

当怡良等人去台湾缉捕姚莹时，台湾众官兵悲愤交加，痛哭投戈；市民百姓成群结队，每天都在钦使行署门口请愿申诉。一时间朝野震动，“中外作诗著论甚众，闺阁中亦多感咏”。朝中官员也多有“见其功，未见其罪”的议论。

群众的呼声表达了爱国和正义，表达了对姚莹的尊敬和爱戴，表达了对姚莹遭遇的同情和不平。姚莹忍辱负重，先后辗转四川、西藏，翻山越岭，道经绝漠，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在藏期间，他虽身遭贬谪，却从未忘国，以极大的毅力了解和研究外国情况，撰写了长达16卷的《康輶纪行》一书，介绍了藏内外、国内外的风土人情、宗教文化，特别是英法两国的历史、英俄关系、英印关系，以及佛教、回教、天主教的起源和发展，还有世界和中国西南边疆的地图，以“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

好心的朋友劝他不要再谈这些事情，以免再招来祸患。他却说：“吾辈立志不在温饱，亦不畏权势，苟能一言一事于斯世有益，所获多矣！”他还说：“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

就这样，这位忠心耿耿的爱国官员在西部边疆待了5年之久，直到1848年才因病返回原籍。1850年咸丰帝登位，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调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惩办了投降派头子穆彰阿，重新起用了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姚莹被任用为广西按察使，1853年病逝于任上。

大败洋枪队的农民英雄 ——李秀成

1860年盛夏的一天凌晨，上海城外青浦一带枪炮齐鸣，杀声震天。英雄的太平军战士正在与美国流氓华尔组织的“洋枪队”激烈交战。这是太平天国第一次在战场上与帝国主义较量。“洋枪队”依仗武器优势向太平军阵地猛扑。太平军不畏强暴，奋勇反击，终于把“洋枪队”打个落花流水。这一仗共歼灭洋枪队六、七百人，缴获洋枪2000余支，大炮10多门，华尔身中5伤，仓皇逃命。“青浦之战”的指挥者，就是太平天国杰出领导人忠王李秀成。

李秀成1823年出生于广东藤县一个雇农家庭。8岁开始随舅父读了两年书，后因家贫，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工务农。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民头上除了封建主义这座大山外，又加上外国侵略者这座大山；更加压得透不过气来。李秀成一家终年劳累，仍然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盼望着苦难生活的结束，盼望无灾无难，人人平等的美妙的“天堂”的到来。当他得知洪秀全等人创办的拜上帝会要在人间建设“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小天堂”时，立刻与全家人一起参加了拜上帝会。1851年9月，太平军路过藤县，他又率全家参加了起义军。

虎在山上行，龙自潭中生。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农民斗争此伏彼起，为李秀成这样的人物提供了施展抱负的用武之地。他作战勇敢，又渐渐显露出军事才能，攻占南京后，担任右四军帅，带领1万名新兵驻守在太平门外。不久，随石达开去安庆安民，镇守庐州。他与活动在江淮之间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捻军建立联系，说服捻军领袖张洛行接受太平天国

领导，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正当革命胜利发展之时，天京城发生令人痛心的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相继被杀。翼王石达开也负气出走。翼王是李秀成的直接领导，翼王出走时要求李秀成同行。李秀成对石达开的文韬武略十分佩服，但是他顾全大局，不同意出走。1857年底，天王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主持军务，陈、李二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两根顶天支柱。此后，陈玉成主要在上游作战，李秀成则活动于天京周围及江浙一带，在东南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支持和拱卫天京。

李秀成是一位忠诚的战士。1859年他驻守天京对岸浦口时，陈玉成先封为英王，李秀成尚未受封。他自己处之泰然，部下却议论纷纷。叛徒李昭寿乘机挑拨离间，来信劝降，不料此事为天王知道，产生怀疑，下令封锁江面，断绝交通，防止李秀成叛变。李秀成内为天王所怀疑，外受敌人威逼诱利，但是他立场坚定，不为所动，继续与来犯的清军作战。如此10多天，天王终于受到感动，亲自在一块黄缎子上书写“万古忠义”四字，赐给李秀成，封他为忠王。

受封以后，李秀成更加积极地为革命奋斗。1860年初，清政府重新建立的“江南大营”在钦差大臣和春的指挥下，在天京周围修筑100多座营垒，还挖了一条100多里长的工事，号称“万里长壕”，把天京城团团包围起来。李秀成仔细分析敌情，决定不与敌人在天京决战。他率领精锐自芜湖出发，昼夜行军，突然于3月19日日攻克杭州。和春见后方失守，大惊失色，急忙抽调“大江大营”清兵1万多人救援杭州。李秀成探知和春中计，立刻放弃杭州，退至安徽，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分五路进击“江南大营”。和春毫无准备，从梦中惊醒，仓皇披衣上马，狼狈逃跑。李秀成指挥大军内外夹攻，踏破敌营50多座，彻底摧毁“江南大营”。

再破“江南大营”后，李秀成乘胜前进，挥军东向，十几天内连克常州、无锡，苏州等重镇，解放苏南大片土地，最后以苏州为中心，建立太平天国苏福省。1861年底，李秀成率军再克杭州，又在浙江开拓大片疆土，与苏福省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地域广大的根据地。

在建设江浙根据地的过程中，李秀成与帝国主义干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攻克苏州不久，李秀成率军继续东进，攻占昆山、嘉兴、青浦、松江等地，直逼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上海。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歪曲《南京条约》有关条款，在上海建立大片租界。英法侵略者俨然似主人自居，威胁太平军“勿攻上海，否则还击”。此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正在京津一带与英法联军作战。但是上海的清朝官吏却“忘记”了英法是敌国，居然无耻地向敌人请求援助。1860年6月，清政府苏松太道吴煦和买办杨坊出钱，由美国流氓华尔出面招募一批外国的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专门与太平军为敌。7月，华尔率“洋枪队”偷袭太平军占领的松江，接着又在万名清军的配合下，进犯驻守青浦的太平军。李秀成在青浦大败“洋枪队”之后，乘胜进逼上海城下。英法联军公然协助清军作战，用山炮、来福枪猛烈扫射太平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军舰也炮轰太平军阵地。太平军义愤填膺，奋起反击，与英法干涉军激战4天。因后方告急，不得不退离上海。

1862年1月，李秀成乘攻占杭州的余威，再次进攻上海。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抵达上海郊区后，李秀成发布文告，严正警告外国侵略者不要干涉中国

内政，如敢继续助清军为逆，那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但是这时帝国主义通过《南京条约》从清政府手里取得更多的殖民特权，它们蓄意加紧勾结清政府，与太平军为敌。帝国主义强盗一面从天津调来英法联军 1000 多人，一面把“洋枪队”大大扩充，改编为“常胜军”，同时还用军舰把李鸿章的淮军从安庆运到上海。中外反动派互相勾结，向太平军阵地疯狂反扑，相继侵占嘉定、青浦，向太仓进犯。李秀成立刻从苏州集中 1 万多名精兵赶到太仓，迎头痛击敌人，经过两天激战，太平军连破敌营 30 多座，歼灭外国侵略军几百人，清军 5000 人，俘获洋枪大炮不计其数。李秀成堂弟侍王李世贤在南桥击毙法国干涉军司令、海军上将卜罗德。接着李秀成穷追猛打，收复嘉定，又在青浦全歼“常胜军”一个团，活捉“常胜军”二号头目法尔思备。“常胜军”残余被紧紧包围在松江城内，惶惶不可终日。正在这时，凶恶的湘军由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率领，自安庆顺江而下，包围天京。天王一天连下三道诏书，命李秀成赶快回师救援。李秀成不得不再次放弃对上海的进攻。进攻上海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太平军在上海外围狠狠教训了外国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决心。

安庆失守，英王牺牲以后，太平天国已进入极困难的阶段。“大厦将颓兮，一木难支”。但李秀成在极艰难的环境下，独立支持，顽强奋斗，使革命又坚持了两三年。

撤离上海后，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太平军 30 万人，兵分三路救援天京。10 月 13 日，他亲自率主力向湘军盘踞的雨花台发动进攻。在长达 40 多天的战斗中，太平军轮番作战，昼夜猛攻，打得湘军恐惶万状、胆破心惊。

太平军虽然勇敢顽强，但在整个战场上毕竟处于劣势。此时外援断绝，既无粮食，又无棉衣，不得不下令撤退。不久，苏州也在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下失守，天京两面受敌，粮食断绝，形势极为险恶。李秀成不愧为“忠王”，他不顾别人劝阻，毅然回到天京，指挥太平军与敌人浴血奋战。1864 年 7 月 19 日，天京终于失守。李秀成保护幼天王突围，他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自己不幸于天京东南山被捕。1864 年 7 月在南京被杀，终年 42 岁。

报国献赤胆 资政有新篇 ——洪仁玕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洪仁玕。他在太平天国天京面临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威胁，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自相残杀，致使“朝中无将，国中无人”的情况下，重振革命大业，以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见解提出政治改革的一系列主张，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导人和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的先驱。

洪仁玕，字益谦，号吉甫，1822 年 2 月 20 日（清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广东省花县官禄埗村一个农民的家庭里。他自幼聪颖，饱读经书，但在科场上却屡试不第，只得在家乡当一名教书先生。科场的失意使他深深地认识了社会现实。慢慢地，他不再把希望寄托于考棚，而是从落第中奋发，和比他大 9 岁的同高祖族兄洪秀全一起，一边在家乡的塾馆中教书，一边审视当时的局势，体察民间的疾苦，探索人生和社会的真理。

古今中外大凡有作为的人物，都是在坎坷曲折的人生旅途上走出来的，

都是在现实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洪仁玕也不例外。1843年，洪仁玕最早加入了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砸了塾馆中孔子的牌位、文昌制君的牌位，以及家中灶王爷的牌位。这在当时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守旧的人们一阵轰动，在村内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洪仁玕为此遭到一顿毒打，并被赶出了家门。那一年他22岁。

带着迷茫困惑和众人的不解，洪仁玕没有过多的申辩和解释，而是踏上了新的征程，沿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坚定地走了下去。他在清远县谋得一个教书的差使，一面教书，卧薪尝胆；一面宣传拜上帝教，发展拜上帝会成员。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洪仁玕得知后，便带领他所发展的50多名拜上帝教信徒，到广西去投奔起义队伍。当他们到达浔州时，起义队伍已从浔州开赴永安（今蒙山县），再加上洪仁玕他们又为清军所阻挡和搜捕，不得已折回广东。第二年，他和洪秀全派去接应他的人一起发动了一次起义。由于势单力薄，经验不足，起义失败。洪仁玕为避难逃到香港。

在香港，洪仁玕经人介绍，做了巴色会传教士、瑞典人韩山文的汉语教师。洪仁玕一面教书，一面潜心学习天文、历法等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还通过韩山文结识了不少外国人。逐渐地，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多方面的了解。这为以后制定太平天国的大政方针奠定了基础。1853年11月，洪仁玕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在此期间，他念念不忘宣传太平天国的革命业绩，写成《洪秀全来历》一书。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洪仁玕得知后，于第二年春天便想奔赴天京，投身革命。在韩山文的资助下，他来到了上海。由于当时苏南一带为清军所控制，洪仁玕几次努力，均不如意。他无法到达天京，在上海又不是长久之计，5个月后，又回到了香港。

1856年6月，洪仁玕满怀对太平天国的眷恋之情，再次踏上归途。临行前，他写下了这样情意深长、气概豪迈的诗句，以表明自己施展才干，报效天国的志向：

枕边惊听雁南征，起视风帆两岸明。
未挈琵琶挥别调，聊将诗句壮行旌。
意深春草波生色，地隔关山雁有情。
把袖挥舟尔莫顾，英雄从此任纵横。

他改扮作商人模样，冒着生命危险，途经广东、江西、湖北，然后顺江而下，排除千难万险，于1859年4月22日到达天京。

由于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杨韦事件”和石达开的出走，老将殉难，精锐离去，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的削弱，新提拔的一些年轻将领也始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太平天国正是用人之际。对于洪仁玕的到来，洪秀全自然格外高兴，对他十分器重。不到一个月，洪仁玕便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全国军政，不久，洪仁玕便提出了建国纲领，这就是《资政新篇》。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较完整的治理国家、振兴民族的改革方案。随后，又制定且颁发了《立法制誨》、《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等书，详尽地阐述了他改造社会和国家的方案。

早在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制订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的改革，试图建成“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

社会，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洪仁玕学贯中西、视野宽广、气魄宏大，他根据当时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形势，回顾太平天国起义以来的革命实践，吸取天京事变后的惨痛教训，总结出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之所以迅速发展，是因为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发展和运用了先进科学技术的经验，提出要因地制宜，审势而行，顺应世界潮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使中国国富民强。

《资政新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四个方面。

政治上、根据当时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状况，提出了要加强中央集权，健全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建立郡县钱谷库和基层税收机构，设立不受一切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廉洁政府。

经济上，大力发展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实行工商自由，创办邮政和银行，奖励发明创造，保护私人权利。

文化思想上，兴学校、开报馆、建医院、改革考试制度，鼓励发展各项社会福利事业，提倡科学技术，反对封建迷信，提倡文以纪实，反对浮文巧言。

外交上，提出“柔远人之法”，反对妄自尊大，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不侵犯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的前提下，扩大与各国的各方面交流。

难能可贵的是，洪仁玕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试图把中国的国家制度由“人制”转向“法制”轨道，试图以此富民强国。尽管《资政新篇》还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尽管不十分全面，但无疑是非常进步的，是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规律的。由于太平天国后期战事繁重，革命队伍中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资政新篇》中的一些改革方案并没有付诸实施。

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这时洪仁玕正在安徽广德，他完全有条件远走高飞，摆脱危险。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国家的兴亡。当得知幼天王突围到湖州时，他立刻赶去，保护幼天王，以图东山再起，为了壮大力量，他们决定到湖北与太平军余部会合。10月9日，他们经过江西广昌城杨家牌时，遭到清兵的夜袭，洪仁玕不幸被俘。

洪仁玕早年投身革命，就以文天祥为榜样；身陷囹圄后，他依旧正气浩然。他曾豪壮地说过：“丈夫自命，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面对凶残的敌人，他威武不屈，只求速死，来实现自己的誓言。1864年11月23日，他在南昌英勇就义，终年43岁。

洪仁玕在狱中，尽管受到了酷刑的折磨，但始终对太平天国抱有坚定的信念，对自己献身的事业忠心耿耿，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坚强不屈，无怨无悔，表现出了高尚的气节和大无畏的精神，堪为后人楷模！

火烧望海楼 驱逐传教士

望海楼矗立在天津三岔河口，是法国侵略者建造的洋楼。火烧望海楼发生于1870年6月21日。这天，天津城内突然鸣锣聚众，成千上万的群众从大街小巷咆哮着、怒吼着，冲向望海楼。群众看到久为痛恨的望海楼，怒不可遏，放起火来。顷刻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座望海楼顿时化为灰烬。这次火烧望海楼是天津人民自发的群众性的反洋教爱国斗争，又称天津教

案。

天津人民为什么火烧望海楼？这得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无孔不入谈起。

外国侵略者在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侵略中国的同时，为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还加紧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就是外国侵略者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

自称是传播“文明”和“福音”的传教士，通过宗教的宣传，向中国人民灌输一种“忍耐、保守利受苦受难的基督精神”，妄图使其“乐天知命”、安于被奴役的地位。侵略者为达到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目的，截止到19世纪末，在华的洋教士共达3200多个，出现了“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的景象。不少的教堂还办起了医院和育婴堂，支起施医行善的幌子，去掩盖罪恶的狰狞面目，诱惑中国人对他们产生好感，认敌为友。暗地里，他们从事残害病者，奴役幼童的勾当，把这类“西方的善堂”变成阴森的魔窟。他们还往往以“中国通”的资格，直接参与或策划对华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并且还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残杀良善、任意欺压中国人民。传教士所带来的灾难，丝毫不亚于鸦片、商品和大炮，尤其是在内地城乡，那里的人民也许不曾听到侵略者的隆隆炮声，也许没有洋货输入而受到猛烈的冲击，但传教士走到哪里，火和剑就跟随到哪里。从传教士的活动里，经常感到山河变色，民族沦亡的严重威胁。中国人民恨透了这些干尽坏事、丧尽天良的洋教士。因此在19世纪下半期，各地区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一浪接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天津教案”就是当时著名的一次。

天津是外国侵略者进行传教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1858年和1860年英法侵略军两度侵犯天津时，他们的头目就盘踞在天津城东北角的望海楼一带，大批船舰，也聚泊在附近海面上。战争结束后，法国根据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强迫天津地方官同意永租望海楼一带作为建造教堂之用。1869年教堂落成，法国传教士得意地说，这是“圣母仁慈和战争胜利的结果”，因而把它称作“圣母胜利之后堂”。这一长达10余年的侵略过程，天津人民历历在目。群众一抬头，就望见这座象征殖民主义的尖顶楼房，象一个魔鬼，俯瞰全城，磨牙欲噬。一提起往事，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洋人走私鸦片、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情景，就不禁愁肠欲断、肝胆俱裂，胸中燃烧起愤怒之火。

1870年初夏，望海楼设立的“仁慈堂”里，每晚都有几个被折磨死去或重病未死的幼童，被装进木匣，偷偷地送到乱葬冈去喂狗。几天内，就有40多具幼童尸体扔在乱葬冈上，被野狗撕咬着胳膊、大腿……其惨象，目不忍睹。同时天津一带又不断地发生幼童被迷拐的事件，而拐犯的供词无不牵连到教堂。于是这个令人发指的消息一经传开，天津城立即轰动起来，街头巷尾，群情激愤，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与洋人评理斗争。

6月21日，天津城内的人民群众不约而同地奔向望海楼教堂怒斥法国侵略者残无人道的野蛮兽行。蛮不讲理的教堂里的法国传教士手执洋枪、棍棒，牵着恶狗，向群众扑来。“是可忍，孰不可忍！”群众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拣起路面上的石块，向野蛮的传教士和恶狗猛砸，石块如雨，打得传教士抱头鼠窜。

此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急得发了疯，带领秘书西蒙，一口气闯进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竟开枪向崇厚射击，连发两弹，未能命中。左右将丰大业推开，他便拔刀乱砍，咆哮不已，然后飞奔出门。这时街上聚集的群众已有好几千人，西蒙在前，扬刀开路，正巧天津知县刘杰带着侍役高

升迎面而来，丰大业又向刘杰开枪射击，刘杰急忙将身一闪，子弹击中了侍役高升，当场死去，西蒙又朝群众开枪。这种目无中国、无法无天、骄横野蛮的暴行，更把群众激怒了，千万只拳头一齐挥动，打死了穷凶极恶的丰大业和西蒙，并投尸河中。午后，全城又锣声四起，填街塞巷的人流，奔腾咆哮，涌向望海楼，发动了对侵略者巢穴的总攻。当天烧毁了法国在三岔河口的洋楼，即有名的望海楼。同时还打死作恶多端的法国教士 10 多人，其他国籍教士、商人 7 人。侵略者受到应有惩罚，天津人民无不心情欢快。

天津人民火烧望海楼的爱国行为，使外国侵略者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法、英、美、俄、德、比、西 7 国，在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怒火面前，狼狈为奸，联合一起，共同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英、美、德等国又调集舰队，屯驻天津和烟台海口，对清政府进行战争恫吓。法乘机向清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声言如不接受必将派遣大军，将天津化为一片焦土。猖狂气焰达到了极点。

腐败的清政府在洋人的压力面前惊惶失措。事件发生后，即派卖国老贼曾国藩到天津查办，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谢罪。以媚外著称的大刽子手曾国藩，早已抱定“委曲求全”的投降方针，他明知天津人民的斗争出于义愤，是正义的爱国行为，法国侵略者是导致火烧望海楼的罪魁祸首，但办理的结果，中国却向法国赔理、道歉，重修教堂，并把 16 个反侵略英雄的头颅，贡献到侵略者的祭坛上。就这样曾国藩及其继任者李鸿章为了媚外投降，不顾天津人民的正义呼声，了结此案。

曾国藩投降媚外的行径，全国呼为卖国贼，人人欲得而诛之。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削籍”，撤去了他在京师湖南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

天津人民没有忘记死去的爱国同胞，为了让后人瞻仰他们，决定公葬无辜的被害者，并立碑建祠，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阻挠，未能实现。

天津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广为传播。天津人民的鲜血没有白流，继天津人民火烧望海楼之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反洋教爱国斗争，不仅使侵略者“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迷梦彻底破灭，而且沉重打击了传教士所进行的其它侵略活动，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斗志。

舆棂出兵 慷慨卫国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人。祖辈三代都在乡村以教书为业。左宗棠从小读书就很刻苦用功，20 岁时中举人，后来连续三次考进士都没有考中，只好在家乡教私塾。他平时关心疆域沿革和历代兵事，对地理和兵法慢慢产生了兴趣。早年郁郁不得志的左宗棠，常以诸葛亮自比，自负“身无半亩，心忧天下”。1850 年林则徐卸任回乡，路过长沙，两人在湘江舟中彻夜长谈。林则徐十分赏识左宗棠，称他是绝世奇才。1854 年湖南巡抚张亮基、骆宾章请他做幕僚，后来曾国藩又请他去督办军务。从此，左宗棠被清政府破格提拔、青云直上，先后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1867 年调任陕甘总督，力挽西北危局，1875 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在法军偷袭马尾军港、福建海防艰难的关头，他抱病要求前去督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整顿福建海防，被清政府誉为“中兴

名将”之一。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民族内忧外患，封建统治岌岌可危，边疆地区也孕育着新的危机。1864年6月，在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新疆地区的一些阿訇、和卓（意为圣裔，即对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后裔的称呼）、伯克（对官长和贵族的尊称）和清朝地方官吏等封建领主煽动新疆各族人民起兵反清。他们先后攻占了库车、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塔城等地，整个新疆地区动荡不安。

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之后，又转而镇压陕甘宁青一带的西北回民起义，对新疆的混乱局面一时无暇顾及。新疆被封建领主拥兵割据后，各集团之间你争我斗，互相残杀，形成了若干个地方势力集团。后来，占领南疆东四城的汗和卓集团和占领西四城的金相印集团势力逐渐强大。金相印为取得斗争的胜利，便向毗邻的中亚伊斯兰教浩罕汗国求援。

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对新疆早有侵略野心。1865年，他在俄、英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悍然率军侵入新疆。阿古柏先后攻占了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库车、莎车、和田、吐鲁番等地，于1867年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汗国），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最幸运之主”），1870年又占领了乌鲁木齐、大山南路和天山北路部分地区，妄图把新疆从我国分袭出去。

与此同时，英国和沙俄侵略者也都想利用阿古柏政权侵占新疆。1868年，英国派人赠给阿古柏来福枪等礼物，还通过土耳其在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和政治影响，给予阿古柏以艾米尔（统治者）的封号，与阿古柏建立了直接联系。1873年，英国派使团到喀什噶尔，带去了英国女王给阿古柏的亲笔信，还给阿古柏运去了两门小炮和一批枪支弹药。1874年2月，阿古柏与英国使团签定了通商条约，英国人取得了在新疆的一系列特权。

沙俄也于1868年派遣一个商人到喀什噶尔活动，1872年又派一个使团到喀什噶尔。6月，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阿古柏政权得到了沙俄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同时，沙俄在新疆攫取了大量的非法权益。

沙俄为维护它在北疆的既得利益，于1871年7月出兵，强占我国伊犁地区，随后又向伊犁地区移民垦殖，把伊犁地区置于阿拉木图的沙俄行政长官管辖之下，设官分治，向当地的中国居民勒索钱粮，进行无耻的殖民统治。沙俄不断地拉拢支持阿古柏，目的是要他对沙俄“臣服”。广大的新疆地区很有可能沦为英国或沙俄的殖民地。因此，收复新疆有着平定叛乱和反击侵略的双重重要意义。

正当准备收复新疆之际，1874年日本出兵侵占台湾。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当时执掌朝中大权的内阁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重“海防”，废“塞防”，放弃新疆。

面对祖国边疆的危局，左宗棠忧愤深广，夜不能寐。他指出“海防”与“塞防”不可偏废，中国与沙俄有万余里的边境线，这已对我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我们持软弱退让的立场，沙俄就会得寸进尺，其它侵略者也会群起效尤。他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表现了他放眼全局的远见卓识和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

这时，国内的农民起义已基本平定。左宗棠的主张又得到了朝野上下多数舆论的支持。清朝统治者也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

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率军三路出关，开始收复新疆。

左宗棠老当益壮、精神振奋，决心“誓与此虏相周旋”。他平时就对新疆有多方的调查研究，因此作战一开始就指出，新疆叛贼虽然气焰嚣张，但是“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而已。”他根据阿古柏的兵力分布情况和清军长驱直入，补给线长的特点，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原则，先“猛打数仗”，以“挫其凶锋”，等北路胜利后，再进攻中路、南路。

6月，左宗棠率领的清军主力越过天山，穿过戈壁，挺进乌鲁木齐。炎热的夏季，暴风骤雨变幻无常，飞沙走石扑面灌耳，似火骄阳，暑气逼人。再加上国力衰败的清政府缺粮缺饷，行军十分艰难。但是，有全军官兵高昂的士气，有收复失地的坚强决心，有沿途群众的大力支援，清军一月行程3000里。8月，就廓清了乌鲁木齐外围，随后一鼓作气，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北路4城，还打败了阿古柏所派的援兵。11月，收复了北疆。

在左宗棠收复北疆的同时，沙俄加紧了侵略活动。它想在阿古柏政权灭亡之前，造成一个既定事实：与阿古柏签订一个边界条约，把准噶尔西部的大片领土划归沙俄。左宗棠及时洞察到了这个阴谋。所以，收复北疆后，他立即指挥大军南下，势如破竹，迅速收复了吐鲁番。1877年4月，进攻南疆门户达坂城。

敌人为了遏止清军前进，堵塞了开都河（通天河），使河水泛滥，造成喀喇沙尔、库尔勒之间百余里一片汪洋。但清军不为洪水所阻，连续6昼夜，追击敌人900里。阿古柏见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到1878年1月，除伊犁外，天山南北全部回归了祖国。

随即，左宗棠向清政府建议把握时机，收复伊犁，“乘此兵威，迅速图之”。因为如果拖延日久，沙俄必将“愈进愈逼”，而清军也会“馈运艰阻，势将自绌”。

1878年6月，清政府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全权大使，到俄国进行谈判。

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如此迅速地收复新疆，沙俄是料所不及的。他们内心并不真正想把伊犁归还给中国。于是沙俄便怂恿和庇护逃到俄境的叛匪伯克胡里和白彦虎残部，在边境地区制造混乱，然后再以地方秩序没有恢复为由，拒不归还伊犁。左宗棠看穿了沙俄的阴谋，他一方面奏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交涉，主张与俄人断绝通商贸易；一面狠狠打击残匪，使敌人的阴谋破产。

崇厚在沙俄的威逼诱惑下，竟以割地、赔款、通商等特权为代价，换回伊犁一座空城，擅自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来，舆论哗然。左宗棠更是痛心疾首。他立即上奏朝廷，说明收复伊犁必须要以武力作后盾。他写道：“自从俄人窃踞伊犁，蚕食我领土不已，照此下去，新疆迟早被吞并。现在我索要伊犁它则要我赔款卢布500万，而崇厚还答应把伊犁西南之地归俄，这岂不是割地求和！我一矢未发，随便给俄人土地，此万万下可允许之事。”他还写道：“为今之计，应先以理力争，如行不通，就决以战阵，必以坚忍而求胜。臣虽年衰才庸，敢不为国奋勉？”朝廷看后赞扬他的忠心与勇气，下令对他进行嘉奖。1880年2月，曾纪泽被清政府任命为驻俄公使赴俄交涉，“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左宗棠也奉命部署军队，做好武力收复伊犁的一切准备。他兵分三路，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当时，已经69岁的左宗棠用车为自己拉了一口棺材，豪迈地说：“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由于左宗棠的积极备战和曾纪泽的据理力争，沙

俄不得不重修条约，中国收回了一部分既失的主权。但由于清政府决定与沙俄妥协，这个草草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实际上还是个不平等条约。

在收复新疆的同时，左宗棠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根据当地的水草特点，发展农牧业和林业生产。他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介绍到新疆，借贷生产资料给农民，提倡植棉栽桑，养蚕织绸，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同时安置了大量难民。他还建议设置行省，建立郡县，改革赋税制度，使新疆的社会局势很快稳定下来，生产和经济在短短几年内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879年，清政府在新疆按“十一税一”的政策，共征粮21.19万余石，1880年增至34.72万余石。当时杨昌看到绿树成荫的新疆，不禁触景生情，写道：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综观左宗棠一生，他参与了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是封建王朝中的一名封疆大吏。但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分崩即在眼前之际，他又能力排众议，挺身而出，收复失地，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在维护国家统一、捍卫民族尊严方面不屈不挠的反侵略精神。对此，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障流挽波 虎口索食 ——曾纪泽

1871年7月，沙俄乘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之机，悍然出兵吞并伊犁。清政府为收复这一西北边陲的重镇，曾多次派出使臣与沙俄交涉，但都未获成功。1880年7月，曾任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去圣彼得堡，为《万里瓦几亚条约》与沙俄举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他决心为了祖国的领土完整，“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曾纪泽不负众望，据理力争，思路敏捷，谈锋“似柔实劲”，使沙俄代表叫苦不迭，终于将沙俄强占10年之久的伊犁大部分地区，从“虎口”中索回。无怪乎沙俄外交大臣格尔在签字后感叹：“我办外交事件42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

勤奋好学

曾纪泽，湖南湘乡人，字劼刚。曾国藩长子，近代著名的外交家。1839年生。年青时代留心西学，为了直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寻求富国强民之术，曾纪泽在33岁那年开始自学英语。当时他在偏僻的湘乡，一无教师、二无教材、三无同学互相探讨，环境完全闭塞。他以惊人的毅力，靠着英文字典，用汉语“形声训诂之学”和“泰西字母切音之法”，进行比较研究，用5年的苦功，独立掌握了这门外语。到1877年承袭侯爵进京觐见时，他已经可以用英语与同文馆中的英、美籍教师交谈了。现在伦敦博物馆保存有他手中的一柄“中西合璧诗扇”，扇上的中、英文诗篇，均出于曾氏自作自写，可见他的英文造诣之高。

1878年，曾纪泽被派为驻英、法公使，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他在欧洲任职时，广泛留意当地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与各界人士接触，极力探索各国富强的原因。他尽可能扩大视野、增长见识，表现出

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态度，在清政府的外交使臣中崭露出不同寻常的锋芒。

艰巨使命

1871年7月，沙俄强占伊犁后，清政府内部围绕收复还是放弃新疆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1875年，清政府采纳左宗棠等人加强塞防的建议，进军新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左宗棠仅用两年的时间，就收复了北疆，平定了南疆。1876年，清政府平定天山北路，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后，又根据沙俄在强占伊犁时作过等新疆大局稳定“当即交还”的诺言，再次向俄方提出归还伊犁的问题。从1876年1878年3月，清政府曾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訢、清朝驻俄帮办大臣刘锦棠，以及伊犁将军金顺，与沙俄驻华公使布策等人进行几次交涉。结果，俄方竟以先商定西路通商事宜再谈伊犁问题来搪塞，或是以事关重大，难在擅专，俟禀总督后再行定义为借口，玩弄左推右诿的把戏，阻挠归还伊犁谈判的进行。

清政府反复交涉，仍不得要领。1878年10月，决定派遣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出使沙俄全权大臣，赴圣彼得堡，直接进行谈判，要求沙俄履行诺言，归还伊犁。然而，昏庸无能的崇厚经过一年的交涉，竟在俄方所谓的盛情款待和花言巧语的欺骗下，于1879年10月，擅自与沙俄签订了所谓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个条约使沙俄不仅获得了伊犁的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河谷一带地区的大片领土，而且还取得了重新调整喀什噶尔和塔尔巴哈台两地边界等一系列特权。这一条约的签订，使沙俄从中国所得的东西，已经超过了甘愿冒战争的危险能保持的东西。俄方谈判代表热梅尼在条约签订后表示，俄方是决不会轻易地放弃从中国方面所取得的商业和战略上的利益的。

崇厚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舆论大哗，伊犁乃我国西北重镇，新疆的门户，今若举伊犁而弃之于俄，那新疆将不可保，大清帝国也将不可保；崇厚丧权辱国，出卖民族利益，应予惩处，对所订条约也应不予承认。清朝政府统治集团中就崇厚订约问题，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左宗棠主张对沙俄“先折之以议论（交涉），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这种和战并用的主张得到了清朝政府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的赞同。李鸿章又重弹他的卖国老调，他要求履行崇厚所订条约，借口换取沙俄的“帮助”，防止日本侵犯台湾、朝鲜。他这种卖国主张，实际上是使中国完全成为沙俄卵翼之下的殖民地而已。清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立即声明：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不予承认和批准。同时，将崇厚逮捕下狱，判处“斩监候”，用以平息民愤。恼羞成怒的沙俄政府，一面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一方面在中国边境增兵，以武力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决定改派曾纪泽再度与沙俄谈判。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沙俄正逞凶中亚，岂肯轻易把到嘴的肥肉吐出来？清廷颀预孱弱，守住“不欲轻开衅端”一句空话，毫无主见。各派政见纷纭，“总署有总署的意见，京官有京官的意见，左帅有左帅的意见”。曾纪泽分析：伊犁是新疆的门户，而新疆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权衡利害，他主张对领土主权“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对通商赔款等项只能忍痛“人权应允”。他又建议朝廷在西北倚重主张以战求胜的左宗棠，同时饬令南北洋大臣加强东海各口守备。在当时昏昏噩噩的官场中，能够做出这样透彻分析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据理力争

1880年初，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后，立即举行谈判。

8月4日，曾纪泽率随员初次到沙俄外交部，与之商谈递交国书日期。谈判开始后，曾纪泽首先发言说：“本大臣此次奉朝廷之命，前往贵国，与在座诸位商谈修改崇厚之约，收回伊犁以及其他方面权利的，希望诸位予以支持。”话音未落，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就摆出一副拒绝谈判的架势，恫吓说：“条约既已签订，现在只候照行，无可商议。”谙熟国际惯例的曾纪泽当即指出：“各国订约，必俟两国批准方能施行，如所订之约有难行之处，例可再议。”吉尔斯顿时无言以对。忽然，他转变话题，说曾纪泽不是头等公使，无“全权”头衔，企图以此来刁难中方。曾纪泽马上反驳：“诸位如果没有忘记的话，西洋各国公法上不是清清楚楚地写着，凡奉派之公使，无论头等二等，皆称全权吗？本大臣虽职二等，不称全权，但只要遇事请旨，不私心自用，无论何等，莫不皆然。”一席话又驳得吉尔斯理屈词穷。

力挫强暴

吉尔斯、热梅尼是狡诈的外交老手。他们在企图阻挡中俄商改原约的第一轮谈判失利后，8月24日专门召开讨论会，研究与曾纪泽重开谈判的对策。沙俄政府采纳了吉尔斯的意见，派驻华公使布策赴北京与清政府举行会谈；同时，派海军上将率舰队开往远东相威胁，妄图采取外交讹诈与军事压迫相结合的策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训令曾纪泽一定要据理力争，在俄京谈判。曾纪泽与沙俄外交部再三交涉，俄方同意召回布策，谈判仍在圣彼得堡进行。

10月9日，中俄双方关于特克斯河域的归还问题争论异常激烈。俄方软硬兼施，曾纪泽镇定沉着，与沙俄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驻华公使布策蛮横地指出：如中国要特克斯河，则“须以相抵地方补偿本国”，接着他又追问曾纪泽：“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曾纪泽立即严词拒绝：“我想自今以后，中国土地，断绝再让之事！”沙俄外交部重要官员热梅尼又威胁曾纪泽说：“如中国政府不能按俄方条件订约，那就不如打仗合算。”曾纪泽回答道：“若沙俄一味坚持，那清政府就将把前约全行废弃，缓索伊犁。”热梅尼以为有机可乘，急忙要求：“不说明伊犁地方归俄国管辖，将来中国复索此地，岂不为难？本国之意务求结实办法，免得含糊。”曾纪泽回答：“中国断不肯办一文书，将该处地方送与俄国。”并补充说：“中国将来再索伊犁，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俄方代表一听，害怕谈判破裂，有损自己其它方面的利益，最后被迫同意将其所占领的特克斯河流一带全数归还给中国。

11月1日，热梅尼在照会中，公然提出要中国“补偿”其“兵备设防”费用，理由是中国不同意《利发第亚条约》，又不向俄国商议，竟然调兵制械，与俄国不睦，逼得俄国不得不花销大量费用来从事兵备设防，所以应向中国要求“补偿”。这真是地道的沙皇俄国的强盗逻辑，本来是它占领中国伊犁，调兵遣将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反诬中国对俄国不睦。曾纪泽严词拒绝了赔偿“兵费”的无理要求，明确指出：中国不是战败国，为什么要向俄

国赔偿“兵费”。并说：设防兵费“俄国既可以向中国索取，中国亦何尝不可向俄国索取。”沙俄外交大臣热梅尼竟然无耻地说：“无论兵费不兵费，总算是俄国要钱。”他还说：同中国人谈判，必须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必须把手按在剑柄上，准备和决心拔出它”，“我认为最好是不拘采取任何形式，尽量从他们手中多索取几百万”。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也叫嚷：“我认为必须向他们露一露牙齿”，“我们不能放弃要求赔偿，如果中国人不愿意理解这点，则我们只有向他们伸出拳头”。老沙皇的狰狞嘴脸暴露无遗。

这样，从 1880 年 8 月初，曾纪泽同沙俄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他面对吉尔斯、布策、热梅尔等狡诈狠毒的外交老手，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坚持“争一分即少一分之害”的主旨，同俄方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唇枪舌剑，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最后，中俄双方终于 1881 年 2 月 14 日，重新签订了《伊犁条约》。

返回祖国

《伊犁条约》签订后，曾纪泽率中国谈判代表团返回祖国。

《伊犁条约》和《里瓦几亚条约》相比，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为祖国争回了许多主权。

在界务方面，中国收回了伊犁南面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部分土地；在离桑湖和喀喇额尔齐斯河下游地区的界线，改为在 1864 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里瓦几亚条约》之间，“勘定新界”，为中国收回了大片领土

在商务方面，《里瓦几亚条约》准予俄国设立领事的地点有 7 处，曾纪泽将其改为嘉峪关和吐鲁番两处；在陆路通商线上删去了嘉峪关至汉口一段；水路方面，删去了俄轮由松花江航行到伯都讷的专条；把沙俄在新疆免税贸易的特权改为暂不纳税。

曾纪泽虽然没有全部废除崇厚原约，但在当时敌方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能为国家挽回这么多主权，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当时英国报纸刊登的一段文字也可看出，曾纪泽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同寻常的，该文这样写道：“俄人力求广地，日肆狼食，所据疆域，未有得而复失者，有之，自伊犁始。”

当然，曾纪泽在中俄伊犁交涉中，面对强敌，坚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能从“虎口”中夺取一部分国权，这除了他个人在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中表现出沉着机智的才能外，更重要的是国内各族人民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对他的外交谈判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才使他取得胜利。曾纪泽的爱国行为与清廷内部软弱、腐朽的崇厚之流相比，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镇南关老将显虎威

——冯子材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在中国人民援越抗法的反侵略斗争中，有一位年近古稀、身先士卒、英勇杀敌，指挥清朝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沙场老将，他就是清末名将冯子材。

冯子材，字南干，号萃亭，广东钦州（今广西钦州）人，1818 年（清嘉庆 23 年）生，他原是行伍出身，1850 年参加过刘八领导的广东天地会的反

清起义，1851年5月，接受了清政府的招抚。从此，他成为清军中的一员骁将，先后随从向荣镇压太平天国和贵州苗民起义，1862年升任为广西提督。冯子材为人豪爽、耿直，他65岁那年，因不满朝廷中一些权贵的弄权，特别是受不了新任广西巡抚徐延旭斥异己人、嫉贤忌能的劣行，他借口有病，辞职还乡，解甲归田。

面对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莫不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们坚决主张援越抗法，保家卫国，群众性的反侵略怒潮风起云涌。居住在中越边境地区的苗、瑶、壮、汉各族人民，更是强烈呼吁清政府援越抗法，并在苗族项素周的领导下，开始回击法国侵略军的不断挑衅。当时，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和”与“战”两派的分歧与争斗。清政府虽然一时“和战仍无定见”，且由于外交大权操在李鸿章手里，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总的倾向是采纳主和派“避战求和”的主张。这种态度，助长了法国的侵略气焰。法国侵略者以“和谈”作烟幕，不到5个月，就占领了红河三角洲；接着，又软硬兼施，诱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可是，法国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法军兵分两路，不断向中国边疆挑衅。1884年8月，法国舰队先攻陷了台湾基隆炮台，后袭击了停泊在马尾港的福建水师舰船；又得寸进尺，肆无忌惮地骚扰中国南部边疆。

1885年2月，法国侵略军猛扑中越边境的谅山和镇南关（今友谊关）。清军前线统帅广西巡抚、淮军将领潘鼎新在李鸿章“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的指导下，胆小如鼠，不能身先士卒抗战，而退到镇南关以北140里的龙州。法军乘机长驱直入，占领了谅山这一重要据点，并一度闯入镇南关。法国侵略者占领镇南关后得意忘形，叫嚣要拿下广西，并在关前竖立木牌，用中文写道：“广西门户，已不复存在。”镇南关是广西通往越南的要隘，广西的人民看了这块牌子之后，义愤填膺，他们针锋相对地也在关前立柱，写着“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表达了中国人民誓死抗战的坚强决心，给予法国侵略者以坚决、响亮的回答。

谅山、镇南关的溃败，后果极其严重，影响遍及全广西。就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在乡下闲居的老将冯子材按捺不住心中的忧虑，不时抚摸着自已的佩刀，唉声长叹，多么盼望能重新横戈跃马，与侵略者血战沙场。随着南部边关形势的日益紧张，朝野上下要求援越抗法的正义舆论不断高涨。这时，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挽回不利形势，起用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在全国人民反侵略气氛的推动下，欣然受命，挑起了保卫祖国南部边疆的重担。

1885年2月，老将冯子材和他统率的队伍，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气氛中，雄纠纠、气昂昂地开到前线。冯子材深得前线军民的拥戴，被推举为“前线主帅”，获得前线军事指挥权。他首先团结各路将士，大力整顿潘鼎新的溃军，迅速稳定后方。同时，广泛联络边民加紧修筑工事，积极准备反击侵略军，收复镇南关。法国侵略者慑于中国军民的强大声势，炸毁镇南关，把重兵退驻到关外30里的文渊城，伺机反扑。鉴于镇南关已被焚毁，为了防备法军的袭击，冯子材决定移驻关内10里的关前隘构筑防务。这里两旁高山峻岭，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他亲自勘察阵地，选定战场，布置防御。他指挥将士在隘口垒起了一条长达三里半的长墙，横跨东西两岭，并在岭顶上修建了炮台，以便居高临下，轰击进犯之敌。接着，冯子材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

他自己所率的“萃军”当中路，扼守长墙和山头要塞；命令王孝祺军驻在山后半里远的地方，为后路；苏元春军驻在隘后5里的幕府地方，为西路；王德榜军驻在关口以东30里的油隘地方，为东路。各路人马与中路军构成犄角之势，便于互相策应。

法军探知冯子材已作了严密的部署，不敢正面进攻，便施展从侧翼偷袭的诡计。冯子材得悉法军偷袭的密报后，毅然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一面加强防守，一面主动出击，命令苏元春的西路军狙击，又派出“萃军”的一支部队直刺法军的据点扣波。当法军从侧翼来犯时，立刻遭到了苏元春部的迎头痛击，溃逃到驻地扣波时，又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萃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败逃，钻进了文渊城，冯子材又亲率“萃军”和王孝祺部袭击了法军前哨据点文渊城，一度冲进城中街心，摧毁了山头炮台中的两座，打乱了法军的侵略布署，提高了将士的战斗情绪。

前线的法军受挫，3月23日晨，盘踞在谅山的法军，在尼格里的指挥下，倾巢而出，向镇南关猛攻。法军兵分三路，两路进攻东岭炮台，一路猛扑长墙。他们在先进的开花大炮的掩护下，来势凶猛。法军先攻陷了东岭的3座炮台，然后居高临下，掩护部队向长墙进攻。就在这紧急关头，冯子材激昂地向将士们大声疾呼：“如果再让敌寇闯进关内，我们有何面目回去见两广父老！”在主帅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全体将士奋勇杀敌，誓与边墙共存亡，终于杀退了侵略军的猖狂进犯。

3月24日黎明，法军再次兵分3路乘雾鼓噪扑来。炮火比前一天更加猛烈，长墙有几处已被轰塌，有的法军甚至已爬上长墙。形势万分危急，在长墙上督战的冯子材，为了鼓励将士合力奋勇杀敌，便下令反攻。这位中等身材的老将，头裹帕巾，脚蹬草鞋，朱颜鹤发，手执长矛，健步如飞，一跃而出长墙，左有长子相荣，右有次子相华，一起冲入敌群。全军将士为之感奋，立即象暴风一样从墙后卷后敌群，与侵略军展开肉搏战。在两军厮杀激战中，关外1000多名越南义勇军也风驰电掣地冲杀进来，法军腹背受攻，全线崩溃，被压下了山谷。清军把东岭上的3座炮台全部夺回，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3月25日，冯子材命令发起总攻击，中国军队和越南义勇军个个争先效命，潮水般地向山谷里的敌人冲击，法军全线崩溃，丢下1000多具尸体，纷纷朝谅山方向逃跑，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

镇南关大捷后，冯子材为了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决定率领各路大军即日启程，乘胜追击敌军。他命令王孝祺与“萃军”一起，从镇南关正面出击，王德榜军自油隘侧面夹攻。他们一路上人不解甲，马不停蹄，斩将夺关，一举攻克了文渊城，进逼谅山，攻克了谅山前哨阵地驱骡墟，扭转了中法战争的整个战局。

3月29日，老将冯子材巧妙地运用“正兵明攻，奇兵暗袭”的战术，率大军攻下了法国侵略军盘踞在越南北部的军事基地谅山。把配备精良的法军打得落花流水，法军前线司令尼格里也身受重伤，退出谅山逃命。这就是在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著名的“镇南关——谅山”大捷。

在镇南关——谅山大捷后，“冯子材的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乘胜又收复了谷松和屯梅，接着又向朗甲进军，准备再取北宁、太原，最后直捣海阳、光复河内，预期在一年之内，全部收复越南的大好河山。与此同时，刘永福率黑旗军也在西线临洮发起了反攻，大败法军，接着光复广威、黄岗屯、鹤江、老社等地。镇南关大捷震撼了法国，3月30日，茹弗理内阁垮台。

从整个局势来看，中法战争将有可能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法国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不意，正当前线捷报频传，法国政府垮台，中越军民准备乘胜追击的关键时刻，清政府竟然下令前线停战，并限期于4月17日撤退，重演了一幕“金牌突诏岳家军”的历史悲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转直下的局面呢？本来，清政府对法宣战是被迫的，根本就没有打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尤其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出于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目的，始终抱着与法国妥协退让的态度。这时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既害怕中国获胜会危及自己在华的侵略权益，又怕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过多扩展势力，对自己进一步扩张不利，因此一再进行所谓调停活动，并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催促清政府与法国媾和。

4月4日，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代表清政府在巴黎与法国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缔结了正式结束中法战争的不平等条约《中法新约》，即《中法令订越南条约》十款。这一来，一场反侵略战争的巨大胜利，被反动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断送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让广大群众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爱国志士日益感到亡国的威胁，进一步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以老将冯子材为代表的前线爱国将士，接到朝廷的“停战撤退”的命令后，都非常气愤，他们有的痛苦流涕，有的拔剑戳地。冯子材目睹这一悲壮场面，数次致电朝廷，要求“诛和议之人”，废除和约，并向朝廷强烈表达了前线将士矢志抗战到底的决心。可是，除了遭到腐朽朝廷的严加斥责外，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位壮心未已的老将军，只得忍痛奉诏，挥泪班师。在冯子材的大军班师回国的路上，中越两国人民挽辔乞留，痛苦不已。

中法战争后，冯子材先后任云南、广西、贵州提督，于1903年病死于军中，享年80岁。他的爱国英雄事迹将永远将在中、越两国人民的心中。

谤与身灭 积久弥辉

——郭嵩焘

1876年12月初的一个雨夜，……海浪扑打着船舷。郭嵩焘紧抓船栏，一任风雨的吹打，透过夜幕和雨雾，他仍依稀得见渐渐消失在远处的海岸和亲切的灯火。此时，在跨出国门的时刻，郭嵩焘百感交集，浮想联翩……。

1875年，马嘉里案发生后，英国人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并且要中国派使赴英赔礼道歉。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答应这一要求。祖国危难，不能为一己荣辱安危置国家而不顾，郭嵩焘承担了驻英公使的艰巨使命。然而接踵而至的却是士大夫们的人身攻击。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使臣多有来者，出国公使却无一人。封建腐儒们认为：“天朝上国，何至换使‘夷人’，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颦笑，徒重辱国而已。”因此，根本没人议及出使之事，更何况负辱使外。对郭嵩焘出使，有人认为是操守不谨，有的甚至视他为“汉奸”，竟编出对联讽刺他。郭嵩焘气愤之极，反言相质：“数万里行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

这就样，郭嵩焘负着屈辱的使命走出了国门，成为我国第一个驻外使节。

1818年4日，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青少年时曾先后就读于湘阴仰高

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1837年乡试中举，他是20岁的热血青年。不久，“禁烟起衅，罢战议和，割地赔款，传教通商，均所目击，必焉伤之。”因而刻苦学习，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为保邦制治以自立于不败，”而投向“开眼看世界”的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之中。1847年考中进士，1853年授职编修，以后历官数省，分任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署广东巡抚等职。1875年3月授福建按察使，旋被擢为兵部侍郎，出使英国大臣。

郭嵩焘不屈附权贵，不计较名声，为官廉直，敢于任事。在天津筹备海防、治理两淮盐政，都卓有治绩。他说：“当官勿避事。”“作伪心劳，不如一实。”他同情民众之苦，认为：当官者“平易近民，为政之本。”清军酷杀暴掠百姓，他“为之流涕”；对那些助洋人残害中国人的官吏，尤为痛恨。1858年6月，两广总督把一个击毙夷兵的民勇抓来交给英人，竟被用铁钩钩在背上活活吊死。郭嵩焘闻听此事，愤怒已极！“民为朝廷毙贼，官乃为贼毙民，粤事岂堪问哉！”马嘉里案发生后，郭嵩焘不避利害，积极建议，竭力寻求有利于国家的解决办法。

郭嵩焘就是这样怀着一颗爱国之心走出国门的。

经50多天的航行，1877年1月21日郭嵩焘一行到达伦敦。

在英国，郭嵩焘顿感耳目一新，他觉得外国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因此，他将自己所见所闻的日记整理成一册，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汇报了香港、新加坡等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军事、生活及民俗。不料遭到士大夫们群起诬攻，说他对国外“极意夸饰”，甚至说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腐败的清政府勒令将其毁版禁印。

郭嵩焘在诽谤和打击面前，并不退缩。而对国外日进无穷、其势相逼的形势，他心中急如火燎、万分焦虑。他说：“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应“反手关自己大门”。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从昏睡中猛醒，幡然振作呵！他除办理外交事务外，每天都有自己的考察和学习项目。他旁听英国国会，研究外国政体和政治法律制度；搞教育调查，去学校详细询问学制及学习内容；参观科研机构、博物馆、图书馆、报馆和各种展览；考察军队、监狱、工厂、矿山、码头以及民土风情。他特别注意铁路、轮船、电报和新发明的各种科学技术。他把每天参观的情况极为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50多万字的日记。这是对当时英国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全面考察报告，字里行间显露着郭嵩焘好学向上的爱国之心。连外国人都认为，他“论事如其所见，所详报者皆所得于西洋，而有益于中国之事。其尤可称赞、令人思其为国之苦心，在将外国实事好处切实说尽，以求入于偏疑猜嫌中国人之耳”。

身为外交使臣，郭嵩焘感到，“吾之蹇运实与国家蹇运相表里”，因此行事慎重。在郭嵩焘去英国之前，英国太古洋行趸船由于在镇江停泊不当，影响江流，冲塌江岸，中国官员要求移船，太古洋行不理，驻华英国公使威妥玛也蛮横拒绝。1877年6月，郭嵩焘照会英国外交部，英方反指责中国不顾两国友谊。郭嵩焘非常气愤，他数次去英外交部交涉，并亲自调查，查阅有关条文，询问国外此类事的处理方法。他正告威妥玛，“此事西洋各国皆有则例”，宜公平处理，“延俟太久，似亦非宜”。争论中，威妥玛声色俱厉，而郭嵩焘正气凛然，“厉声报之”，据理严斥。1878年2月，英国无奈，只好将船移泊。以后，又陆续发生了太古洋行轮船撞沉华商盐船，致死两水手事件和英商怡和洋行雇员枪杀我厦门一渔民事件，郭嵩焘在对英照会中，

措辞强硬，强烈抗议，多次交涉，最后，终于迫使英国给予赔偿。郭嵩焘在英其间，对每一欺侮中国人的事，从不相让妥协，直到合理解决为止。

身在数万里，丹心系国忧。时英俄觊觎找国新疆，英与喀什噶尔伪政权互派“使节”，为此，郭嵩焘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喀什噶尔是中国领土，无权派使，英国必须收回成命。喀什噶尔“使臣”想与郭见面，以求“通融”，郭拒不与谈，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对俄国收抚喀什噶尔叛军头领，他敏锐地感到，“其用心尤有不可测者”，“念之尤可忧也”。他还提醒清政府，日本晚出，“日进无穷”，中国不亟于图强，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腐朽的清政府，听不得郭嵩焘竭诚之言，蚩蚩之士大夫极力攻击诬陷，必欲去之而后快。1879年初，郭嵩焘离英回国。此后，一直在湘阴原籍，主讲于城南书院。

1879年10月，崇厚擅自与俄国订定割袭国土的《收交伊犁条约》，郭嵩焘“位卑未忘忧国”，“条上六事”，主张再派使臣，重订条约。1880年，曾纪泽使俄，改定了条约。

正象他在诗中所说：“我老惭无经国计，早筹方略济时危。”赋闲居家的郭嵩焘，经常谈论必须学习西方以求国家富强。时人“以为忌讳，相顾而不敢言”，他的朋友见辄“相属”、“相戒”，他却不计毁誉，逢人必讲，“庶几渐次有知其义者，犹足及时自立，以不致为人役耳。”他认为办洋务必须政府重视，诉诸教育。认清本末，务求实用。政府应让不知洋务而好议论者出使；多派留学生出国学习，不要搞关门自毙；学习外国不应以兵法为主，而应先学习采煤、冶铁、铁路、电学等，这些“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他反对国家干予私人开矿，“强夺民业”。这些思想和建议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郭嵩焘直到晚年，对鸦片滋害，深恶痛绝。在英国他曾接连上疏朝廷，议禁鸦片，言词痛切，措施具体，促使清政府再次申谕禁令。1879年七、八月间，他在湖南家乡组织了“禁烟公社”，设立公约，定期活动，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就在他临死前，还一再叮嘱子孙，有犯烟戒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

在讲学和朋友往来过程中，郭嵩焘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诗作，计有100多卷。这些作品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和卓越才能。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病逝于农乡，终年74岁。

“千秋论定归青史”。郭嵩焘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分子，其思想和行为都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如早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外交事务中不能将英国政府和人民相区别等。郭嵩焘虽无彪炳显赫的建树，也没有慑人心魄的壮举，但在我国近代历史中，他却不愧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和有胆略、有见识、肯办事的爱国外交家。

当时的国内外人是这样评价他的：“自郭公出洋后，乃使西人有敬爱华人之心。”他“为人和平诚实，签别事理之当，足壮外国人心志，使之看视中国异于昔日”。王先谦评道：“先生于泰西利用之道，推究本末，其有利无弊者，必思仿而行之。”“利在国家，岂图其私，蛮貊可行，州里或疑”，“谤与身灭，积久弥辉！”

